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7 期 2012 年 7 月 15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中美合作所：重庆的另一种美国历史●徐军	2
喜读孙丹年新著《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王川平.....	12
孙丹年的自我救赎●赵晓铃	13
拨开迷雾还原真相●何蜀	15
反右运动是毛氏执政的最大败笔之一●倪艮山	16
略谈反右运动对民族道德伦理的摧折●谭松	18
魂断于家岭●赵文滔	20
一位“死亡”右派在墓地复活的经历●王铁生	40
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陶渭熊	41
我们筑路队的“范哈儿”●凡江	44
京华掠影●丁 弘	49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Yahoo.cn

中美合作所：重庆的另一种美国历史

徐军 (Xujun Eberlein)

按：本文作者为旅美作家，女，重庆人。原文为英文，2011 年 2 月载于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http://www.theatlantic.com> 中译者：George@tecn 译文原载《译言》[yeeyan.org](http://www.yeeyan.org)，本刊有删节。文中提到的 S 即孙丹年，提到她写的那本书稿《探询中美合作所》已经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更名为《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正式出版。

1 序曲

1987 年夏天，我的未来老公 Bob 骑着自行车横穿中国来重庆看我——在我印象中他是第一个骑车横穿中国的美国人。作为一个还没出嫁的女儿，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当时没结婚的人没法分到房子。我的父母 40 年代末都是地下党员，二战后的年月里积极地参加反美抗议活动。所以当一个小美扛着自行车爬了四层楼，走进我们家的单元门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那时候，在重庆这个内陆的山城，自行车和老外都很罕见。西方人才刚刚开始被谨慎地允许在中国大陆境内四处走动——前提是他们不违反这个国家那些经常看不见的各种规矩，也不到处追求我们纯洁的姑娘们。

我的父母仅仅出于他们的好客传统才暂时容忍了 Bob 在这里待上一天（我告诉父母 Bob 是我的研究生院老师）。第二天，爸爸就再也无法忍受他的不舒服，叫 Bob 走人。在下达逐客令之前，他建议 Bob 参观一下坐落在重庆西边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

“什么是中美合作所？”Bob 问。他的问题让我吃惊。从没出过国的我以为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是 SACO（“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就像那时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美合作所”一样。

我于是把那些从小学起就知道了的东西告诉 Bob：中美合作所是个美国人办的集中营，在四十年代折磨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它有两处监狱，一处叫渣滓洞，另外一处叫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叫梅乐斯(Milton Miles)，美国海军军官，中方负责人是戴笠，国民党秘密特务机构（全称是军事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头子。我父母和他们的地下党同志们管戴笠叫“中国的希姆莱（纳粹党卫军头目）”。

Bob 基本上不太关心政治，对我说的几乎没兴趣。他对“美国人办的集中营”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些杜撰而已。Bob 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他在 1987 年来中国之前读过些关于中美历史的书，但从来没听说过这事。

尽管我并不想 Bob 去参观中美合作所，而且不喜欢我父亲试图给一个美国人灌输负罪感，Bob 不屑一顾的态度还是让我很恼火。“这个是真的。”我说。在中美合作所旧址上的博物馆里，我见过用英文标着“美国制造”的手铐，还有照片上戴着那些手铐的尸体。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的原因（实际上八十年代初我就因为些不同看法和文字在政治上惹过一些麻烦），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至少我是这么想的。Bob 只耸耸肩，不相信也不想争辩。

后来回想起来，Bob 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反驳大陆版中美合作所历史的人，尽管他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直觉（以及一点美国人的偏见）。他后来推测说，如果真有那么耸人听闻的、美国在中国办的集中

营，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能获普利策奖的报道机会，而那样的话，中美合作所在美国就应该变得众人皆知才对。

下面这些在中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在政权交替之际，在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座步行距离不远的监狱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那天遇难的有超过200人。在白公馆，处决是分批进行的，直到晚上都还没怎么结束，也就是那时还活着的二十个狱友在一个同情他们的看守的帮助下逃走了。在渣滓洞，狱方用机枪打死了140多名犯人，把汽油浇在尸体上焚烧。有几个人在火海和混乱中逃生。几天后，在大屠杀地点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填满了尸体的坑，那些尸体的手腕上还戴着美国马萨诸塞州 Springfield 生产的手铐。

这个填满尸体的坑，还有两处监狱，都在中美合作所的总部辖区。中美合作所是在1943年二战期间根据一项由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委员长签署的协议成立的。（直到我去了美国才知道，协议上宣称的目的是打击两国的“共同敌人”，也就是日本。）

关押的犯人中大多数是重庆的地下党员。逃生的人里面有一个叫罗广斌的是我父母的熟人。大屠杀十二年之后的1961年，罗和一位合作者出版了一本非常轰动的小説《红岩》，歌颂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英勇斗争。小说里面的角色大多都是根据真实人物写的。事实上，他们先发表了一本短一些的纪实作品《在烈火中永生》，然后才把这本书改写并扩充成一本小说。

随后，一股《红岩》热在很长时间里席卷了新中国。在六七十年代，这本小说在对学校里面的孩子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反美教育上比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成功。这是我在小学二年级时读到的人生第一本小说。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和我同样年纪的人，一直到比我们小十岁的，都读过这本书，有些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很喜欢。小说里面有很多生动的严刑拷打场面，那些打手身后常有代表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高参的影子晃动。有这样高昂的英雄主义主题和紧张的地下斗争情节，我得承认这些故事对于年轻的头脑来说的确很有吸引力。我那时候读得很投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些语言多么充满政治鼓吹和煽情作用。

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话剧，在观众中赚取了大量的眼泪。以红岩为封面的日记本成了重庆最流行的东西。从1963年直到1970年代初，我妈和我姐用的所有日记本都用《红岩》的封面作封面——一块红色的石头上迎风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你可以在亚马逊网上找到这本书的封面。有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有英文版的《红岩》，但我从没读过。）

在我童年时，小说里面一位英雄在拒绝打手们的逼供时念的诗深深地打动过我。我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首诗也出现在早些出版的纪实的那本书里。书里面说写这首诗的是烈士陈然。二十年后，在八十年代，事实被揭露出来，原来这是小说作者“根据烈士的想法”写的。陈然确有其人，但这首诗不是他写的。尽管如此，据一位生活在重庆的历史学者何蜀指出，直到2002年，这首诗在课本里面和诗集中仍出现在“烈士陈然”的名下。

这部小说在毛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化中有着重要位置。书里描写的浪漫化了的英雄主义对于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年轻人有极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在 1967 到 1968 年发生的仅在重庆就死了上千人的红卫兵、造反派武斗中，那些在战场英勇冲杀的青年男女会把自己看作像《红岩》里那样的英雄人物，为了他们的崇高理想视死如归，我一点都不会惊讶。好在我那个时候还年幼；否则我恐怕也会是那些武斗者中间的一个。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我们都只有事后聪明。

2 发展

《红岩》出版之后的 1963 年，重庆开办了一个“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并立刻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两所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和那些配备了美国装备的刑讯室，被作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部分展出。此外还有戴笠给梅乐斯建造的寓所。在寓所墙上的说明里，梅乐斯被描述成一个疯狂反共的美国军官。

热心的参观者们排着长队来这里寻找《红岩》英雄们的踪迹。烈士纪念碑被竖立起来。当我在七十年代上初中和高中时，每年的 11 月 27 日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去扫墓。每次去我们都花一整天参观展览。

美国人的暴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们从来没怀疑过其真实性。小说《红岩》让这指控广为传播，而这个展览更是给它提供了铁证。烈士们是真实人物（其中两位，齐亮和王朴，是我父亲的地下党同志）；中美合作所和那些牢房是确实存在的地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1967 年初，《红岩》出版的若干年后，小说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了。这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时期，我那时十一岁，听着父母的一个朋友描述自杀现场的惨状，震惊不已（不过至今仍有人怀疑罗是被谋杀的）。我那时太小，没法理解一个英雄在熬过了敌人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之后活了下来，在自己一方胜利以后怎么还会去自杀。

* * *

Bob 在 1987 年没有去参观中美合作所。一年以后我们结婚了。中国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父母对于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变化。我们的婚姻在当时是一件偶然个例，但它能够发生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是在中美关系好转以后才发生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人形象也从凶狠的纸老虎变成某种珍稀动物，最后变成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父亲接纳 Bob 作他女婿的条件是“让我女儿远离政治”，而这 Bob 欣然接受了。那正是我们的幸福时刻，我们从没去问他说的是中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治。那一刻我们反正哪个政治都不关心。

我们婚礼上的一位客人是金叔叔，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我年轻时的偶像。1948 年金叔叔曾经被作为地下党抓起来关进渣滓洞，和罗广斌（《红岩》的作者）关在一间牢房里。幸运的是，几个月后金叔叔被他有钱的地主家庭保了出来，幸免于 1949 年 11 月 27 日发生的大屠杀。

在我们的婚礼上，金叔叔又提议 Bob 参观中美合作所。他反复地说：“你一定得看看那些手铐，美国造的！”Bob 很不爽，可他还是微笑着说了些礼貌而又毫无意义、反正金叔叔也听不懂的英文。私下里，他向我抱怨道：“干嘛每个人都要我去看中美合作所？”

Bob 想要做的是骑着他的自行车沿着五十年代修建的川藏公路去西藏。这是他头一年就已经想要做的了。但他的雄心壮志又一次被我的强烈反对挫败了：那段路太艰苦，骑自行车去太危险。

1988年夏天，我跟随 Bob 去了波士顿，在那里安了家，生了孩子，拿到了博士学位，开始为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忙碌的生活让我自顾不暇，根本用不着 Bob 的提醒，我就已经足够地“远离政治”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三年后的一天，双子塔（纽约世贸中心，911）轰然倒下。

对我来说，中国网民们对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而欢呼雀跃，标志着抽象仇恨的回归。我感到困扰：我们那一代扔掉的，新一代又捡了起来。我说“抽象”是因为，我确信，如果一位美国游客和那些年轻中国人中间的任何一个在私下里相遇，这个年轻人会和任何其他其他人一样友好。

我对科学技术的热情减弱了。2002年春天，我请了一个无薪假，和 Bob 以及我们的小女儿回到重庆。在我离开的13年里，这只是我第二次回家。我被这样的一种愿望驱使着：重温孩童和年轻时的故地，理解我的过去。

我父亲又提议我们去中美合作所，但这次他的口气和1987年说这话时完全两样。“他们把那儿扩建了，还竖了很大的雕塑。非常壮观。”我76岁的老父亲快活地说着，就像在说着一个主题游乐园。往日的历史积怨无影无踪。

于是我们就去了。重庆的变化已经让人头晕目眩，尽管如此，我对“烈士墓”的新形象还是缺乏思想准备。

埋葬着几百名四十年代大屠杀遇难者的烈士墓本身看起来依旧眼熟，而这到此为止。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在我的记忆中，本来有苍松翠柏掩映的一排石阶，给这里带来庄严肃穆的气氛，而这现在被肆无忌惮的大规模庸俗商业气氛所取代。一个巨大的褐色群雕——摆着典型宣传姿势的革命英雄们——竖立在一排宽得没边的水泥台阶上面。这里起了新的名字叫“红岩魂广场”。给人的感觉就像有人把死者包装起来在仿高档商场里出售。

一些小学生们把他们的红领巾扔进烈士墓的围栏里，向死者致敬。可是周围无处不在的商业氛围让这动作显得有些滑稽。

我没想到这么政治化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赚钱的好工具。但是很显然，利益的诱惑能让人变得具有意想不到的创造性。曾经是中美合作所训练场的大展厅，现在叫作“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向游客出售昂贵的门票（我不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曾经买过门票）。我估计游客来源并不是问题。我听说，每年都有分配给学校和单位去完成的参观定额，而展览者也在全国进行巡展和煽情的表演。参观者很多，我分辨不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娱乐，受教育，还是仅仅应付了事。（为了省钱，我父母拒绝和我们一起进来；他们在外面的大广场上溜达，就好像重复着他们的晨练。）

展出的内容如果有变化，那也不明显，除了装潢得更精致了。我的确注意到墙上的一个介绍说到美国在中美合作所的代表梅乐斯“除了收集日本情报军事情报之外，主要是积极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府的特务势力”。我不记得这段话之前是不是就在那里，或者反映了对历史的微妙修正。在我孩童和年轻时无数次的参观里，我从没有过中美合作所做过任何有关抗日的事情的印象。

Bob 是第一次到这里，一边看着展览，面对普通人可以对同类做出这样的事情，充满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怖和厌恶。他也很难过，很多使用的东西的确是美国的，而这些碰巧是美国制造的东西竟会如此强烈地影响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但 Bob 从未相信有任何美国人员卷入了这些事里。

在展厅外的另一处展览地点，一组整面墙尺寸的绘画让我停住脚步。严刑拷打被以一种宗教主题的形式描绘出来。一时间我仿佛置身于一所天主教堂里。

于是烈士们现在必须在两个互不相容的领域里担当角色，而任何一个都不曾是他们预料之中的：宗教和商业。

我曾听说博物馆的馆长是所有这些商业开发背后的决策者。他有几本书在这里出售。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题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的书，出版于2001年9月。原来中美合作所还是被贴着“集中营”的标签。

我没想到，几年后，为了探寻中美合作所的真相，我会如此下决心要亲自见到那位馆长，以至于得实施一个小计谋，还拉上我的一个无辜的美国朋友作帮手。

3 谜团

911之后的两年里，我在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上反复踌躇，“辞职，还是不辞？”我最终选择了前者，辞却了我的高科技工作，心怀愧疚地成为一个靠老公生活的作家。

开始严肃的写作后（文革是我那时的主题），我更频繁地浏览互联网。2005年初的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英文网页，上面的内容让我伫步。

作者是一个为他父亲深感骄傲的儿子，他父亲是一位曾在中美合作所服役过的美国海军军官。这篇文章表达了对梅乐斯和戴笠的崇敬，追忆了他父亲在进行“对日军的游击战”时的勇敢事迹。这个网页也链接到其他一些中美合作所有关人员的网站，在那些网站上我读到同样自豪的表述。

那时，我对大洋两岸在信息上的差异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两个无法调和的中美合作所的形象还是让我感到一种切身的困扰。无论是这些中美合作所成员的后人，还是我这样的中国人，是否都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

就像人的口味一样，人很难否定从小就习惯了的观念。不管怎样，我开始研究，开始主要是想依靠英文资料寻找中美合作所涉足渣滓洞和白公馆两所监狱的证据。我遍寻图书馆目录和互联网，阅读所有我能看到的有关中美合作所的信息。在我读过的书里面，有三本特别值得一提。我不会在这里详细介绍每一本，只讲和本文特别相关的一些事。

梅乐斯厚达600多页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二战期间美国海军与中国人的在华联合游击武装罕为人知的历史》，Doubleday出版社1967年出版

梅乐斯是一名美国海军中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在回忆录里，他并不掩饰对中共的憎恶。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依着他的想法，他不会介意把中共跟他的日本敌人同样对待。这本书声称“中美合作所的人员没有被指派去参与反共行动，也没有装备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除了在几次已经报告过的共产党自己进攻我们的中国部队的事件之外”。我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梅乐斯倒可能的确相信这点。我发现他对戴笠无条件的信任显得很天真。但这本书的确给了我这样的印象，就是梅乐斯对设在他的“快活谷”（歌乐山）总部的监狱像是真不知情。这让人困惑。

重庆一位中美合作所研究者最近告诉我，梅乐斯的书在大陆看不到，也没有发行过中译本，不过她倒是读到过一本台湾出版的译文。通过那本译作，她对梅乐斯的印象是“他是位尽职尽责的优秀海军军官。”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作者迈克尔·沙勒，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这是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里引用过的唯一一本外国书（不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之不会早于 1979 年——注：该书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 1982 年），显然是因其对展览有利的言论。作者被尊称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我在 2002 年参观这个展览馆时拍了一张该引文的照片。后来我买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在题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动”（注：中译本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势力蠢蠢而动”）的一章里，找到了展览馆引文的英文原文，摘录如下：

“在战时中国政治和军事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带政治色彩的中美合作所人员在影响中国两个敌对派系的当前政策和未来的前途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美合作所直接卷入中国，心甘情愿地帮助实行秘密的军事纲领，并致力于摧毁革命运动。这一切使它对中美关系发挥了很不相称的巨大影响……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

这一章引用了中美合作所的一些行动来支持上述指控。有一处它引用一个资料来源指责“梅乐斯亲自参与了戴笠进行的大规模审讯，政治犯们在这些审讯后被活埋”，但是没有给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同一章的末尾也有一个间接的指控，称 1974 年“中国媒体登载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说在重庆附近的中美合作所‘快乐谷’总部所在地发掘出曾备受摧残的人体遗骸”。这里指的遗骸一定是我小时候从照片中看到过的，因为 1974 年并没有新的发掘。那一年我高中毕业。

这本书在大陆有中文版。近些年里，几位读过这本书的中国研究者撰文批评展览馆误导公众，断章取义地引用上面那段话，因为那本书明确地讲到它所批评的很多事情都是梅乐斯的个人作为，不符合美国当时的政策。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作者魏斐德，2003 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厚达 600 页的学术著作全是关于戴笠的，他是国民党军统头子，也是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这本书所包含的信息是我所读过的中美合作所历史中最全面的。它详尽地引用了各种资料来源，明确显示中美合作所的美国海军人员既帮助打击日军，也训练戴笠的秘密警察来清除共产党。因此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中美合作所的形象是一个混合体；它既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那么邪恶，也不像那些美国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后代认为的那样光辉。

但我还是没看到美国人参与重庆的两所监狱的证据。

我所看到的另一些美国人的个人叙述中，也有证据显示中美合作所涉足了中国内战。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海军军官儿子在网站上就这样说过：

“应中美合作所的中方国民党领导人戴笠将军的请求，我父亲在中国多留下了六个月，直到 1946 年 3 月，培训中国国民党军队，准备应付他们和中共即将到来的冲突。”

到 2005 年末，我从读到过的资料中确定了两个事实：第一，所有在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国海军人员在 1946 年中就已经离开中国，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参与了 1949 年 11 月 27 日发生的大屠杀；第二，在中美合作所正式撤销之后，美国人将他们的武器装备留给了他们的中国同事，也就是国民党的特工们，而特工们继续使用这些装备以及他们在中美合作所受到过的培训来对付共产党。也就是说，美国人间接卷入了对共产党人的杀害。

但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还不清楚的是，国民党在 1947~49 年内战期间是否继续使用了“中美合作所”这个名字。如果是这样，那么“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标签就掺杂了真实和谎言，成了那种有效并且较难揭穿的宣传。

带着这个问题，在 2006 年中去成都时，我问金叔叔他是否知道，他 1948 年被关在渣滓洞监狱的时候，那个监狱是否属于中美合作所？他说不，他是在解放后的 50 年代初才第一次听到“中美合作所”这个叫法。他关在渣滓洞时，狱方把这所监狱叫做“训育所”。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 1943 至 1946 年间，美国人有没有卷入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酷刑和杀戮。两所监狱都建在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区域内，距离他们的训练和居住区只有步行距离。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三年，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美国人注意到那两所监狱？合乎逻辑的解释似乎只能是他们可能在掩盖他们的介入。

鉴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在 2004 年的曝光，这个问题更显得紧迫。但我犯了个错误，就是在调查中仅仅关注了英文资料。我当时不知道，中国学者早在 1988 年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而他们至今还在努力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发现。

4 探索

没人敢出版 S 花了近 20 年心血完成的十六万字的新书《探询中美合作所》，这让她很沮丧。

她联系过的出版商一开始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然后她的书稿要么在内部审查中被否掉了，要么在通过了第一次审查并被送到上级部门审查后，消失得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S 此前曾经出版过三本书。她之前的一位出版商听说《探询中美合作所》这本书很兴奋。这个出版商问：“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中美合作所抗日的的事情，还是杀害共产党？”S 告诉他是前者。“那我马上就能卖 5000 本！”出版商说。可考虑过审查过程的麻烦之后，他不情愿地放弃了，把她推荐给了另一位出版商。这位出版商也同样地感兴趣，走得更进一步，把书稿交上去审查。那是在大约一年前。S 最近打电话询问，回答是：“没有消息。”她从其他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同样是拒绝，没有任何解释。

我最近读到她书稿的一个节选，从她的个人经历开始。她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读性。拒绝她的原因可能是宣传机构还没准备好让公众看到中美合作所的形象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在学术圈子里这些结论是早已经被接受的了。我说“宣传机构”，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官僚们定下来的规矩通常比起中央政府的政策更僵硬。俗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

和“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形象截然相反的文章已经在各种杂志上面陆续发表了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篇发表于 1988 年秋季刊的《美国研究》，一份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行的季刊，作者邓又平发表了一篇题为《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文章。邓又平是 1956 年出生的重庆人，1978 至 1991 年是“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让他得以接触到未对公众开放的旧监狱档案，因此有坚实的数据支持他的论点。

邓的文章确定，在 1943 年 4 月至 1946 年 5 月的中美合作所时期，白公馆并未被用作监狱。它本是一个军阀的别墅；1939 年戴笠把它改成他的秘密警察（军统）下的一个看守所。在 1943 年春中美合作所成立时，为了安置美国人，戴笠把白公馆改为了招待所，称为“中美合作第三招待所”。1946 年底，中美合作所关闭之后，它才又重新被用作监狱。

尽管邓对渣滓洞的历史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他提供了一份 1939 至 1949 年间在两所监狱中遇难的政治犯的长长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关押时间。这些囚犯们被关押的时间要么在 1943 年之前（不到 20 名），要么在 1946 年 7 月之后（几百名）。1943 年 4 月到 1946 年 5 月中美合作所活动期间，这些人没有关押在那里。邓的文章已经完全洗清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

2008 年末，我通过历史学者何蜀得知邓的文章。何蜀也引用过邓的文章。我在 2009 年 2 月联络到邓又平，在重庆市区的三峡博物馆他现在的办公室见到他。他告诉我说，一位美国参观者曾问他：“对中美合作所的这些指控有什么根据？”

邓为他未提及中美合作所对抗日作出的贡献感到遗憾：“如果我那时写了这些，我的文章可能没法发表。”

邓的文字其实很具颠覆性，但那篇文章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原因之一当然是那份刊物狭窄的学术读者圈子，之二可能是公众对那种分析的接受程度。1988 年对于这种文章似乎还为时过早，它甚至没有引起邓的同事们太多注意。1990 年进入中美合作所展览馆的 S 曾是邓的同事之一，她目前的研究已经比邓的深入很多。昨天我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她依稀记得在 90 年代初读到过邓的文章，但不太记得内容。“大概因为我是个感性的人，”她说。她那时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

S 是重庆本地人。她第一次参观中美合作所展览馆是在 1963 年，她 12 岁的时候。那时她上四年级，老师带全班同学去参观。“我参观后写了篇作文，文字充满了激情。”在书的前言中她这样回忆到，“不只是我，很多人像我一样被深深感动了。”这样的第一印象持续了 27 年。1990 年，作为一名艺术学校的教师在西藏工作了 8 年之后，她回到家乡工作，成为“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是之前的“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十分高兴。在新工作开始的最初两三个月里，她用大部分闲暇时间探寻了这个略微超过两平方公里大小的“文物保护区”的每个角落。

有一阵子她“依然沉浸在小学四年级第一次来这里参观时的感知氛围中”，有些惊叹那种纯真的感觉仍在。她那时 39 岁，不再年轻，经历坎坷。从小她就对自己“出身不好”很敏感，总是生活在屈辱中。她的父亲是大教育家陶行知的一位忠实弟子，努力践行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哲学。然而在 1957 年 S 还不到 6 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位中文教授，被打为“右派”。他被停掉薪水，最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丢下他的妻子艰难地抚养大他们的两个女儿。

文革中断了 S 的中学学习。随后的 10 年里她在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动荡结束后的 1978 年，她通过了全国考试进入大学，学习她父亲曾经教授的中国文学。毕业后，她选择去西藏工作 8 年。

到展览馆工作后，她的敏感很快就受到馆长分配下来的沉闷的日常宣传工作的考验。最初，她对英雄们从童年起的崇敬，和她敬业的态度，让她无暇怀疑。她是位出色的作者，在馆长的指示下写了很多展览文字，甚至演出脚本。一开始她深信她所写的东西。逐渐地，她在行文中的一丝言开始令她困扰。她感到一种内在压力，但无法说出哪里出了错。

她有时感到不解，在与日本和德国进行着残酷战争的期间，美国人为什么还要派数以千计的军事专家来“镇压进步的中国人”。在她看来这不合逻辑。她想解开这个谜，但不知如何下手。

一天，她在朋友家看到一本书，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陈布雷的自传。她翻着书页，一处出现的中美合作所的名字吸引住了她。她读到一桩轶事。书中写到，1944 年，陈布雷从上海唐生明那里得到可

靠情报，日本正将其所有尚存能够作战的战舰组成一个新的大舰队。这个舰队正在琉球群岛附近集结，准备对美国海军发起一次致命的突袭，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

“重庆”（中国的战时政府）立刻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美国海军证实了情报，抢先发起了攻击。这次战役击毁了将近 100 艘日本军舰，给日本海军一个重创。

“送到中美合作所”这句话触动了 S 的神经。为什么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一个集中营？而且要“立刻”？中美合作所到底是做什么的？

于是，一个长期曲折的研究过程开始了，她必须从分配给她的繁忙的宣传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作。

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S 准备公布她的研究成果。她的书将会反驳她帮助完成的展览馆宣传中的一大部分。这本书将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中美合作所，不仅和两所监狱没有牵连，而且对抗日作出了卓著贡献。

问题是，中国公众准备好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这个新形象么？

5 修正

L 担任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馆长已经 25 年了。他出版了很多本关于中美合作所、红岩，还有两所监狱的书。最终在 2009 年 2 月见到他之前，我读过的他的书全都强烈谴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即使他很清楚那些出自他自己工作人员们的相反的研究结果。

2008 年，我忍不住想见 L，听听他这一方的说辞，并当面问他怎么看那些相反的研究结果。我问一位重庆的朋友知不知道如何找到 L。朋友说，“找他干嘛？他不会说实话。”其他人告诉我不可能见到他，“他可是个大忙人！”

2009 年 2 月我又回到重庆。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认识 L 的一个亲戚，认为能帮我约个时间见到 L。他对自己的关系很有信心。第二天，他打电话来抱歉，L 径直拒绝了。

几天后，一位美国作家朋友丽萨·布莱克曼（她出版了一本很棒的惊悚小说，故事背景设在中国）来重庆，我们一起去了红岩村。这个展览馆与中美合作所相距十来里，不在一起但有关联。L 也是这个展览馆的馆长，并且他主要在这里办公。

下午参观完准备离开时，我和丽萨经过了通往 L 办公室的小路。我决定试试运气。想到 L 可能比较在乎他的国际声誉并可能更愿意见外国人，我就拉着丽萨和我一起，简单地和她说了我的打算。丽萨很够交情地答应了。一路上我们被拦住了三次，先被一位扫地的妇女，然后一位男士，最后是 L 的秘书。每次都被问到有没有预约，每次我都回答“有”。最后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幢二层小楼，秘书让我们在下面等候，她上去请示她的老板。如我所愿，两分钟后我们被带了进去。（我这么利用丽萨，要再次向她道歉。不过她的外国人面孔显然起了作用。）

L 身材强壮，略微发福，大约 50 多岁，穿一件蓝色夹克和牛仔裤。他坐在一把红木椅子上，两位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在边上服侍。

他把一支烟放到嘴边，一位女服务员给他点燃。他的秘书端来茶。我和 L 用中文交谈，丽萨在旁边倾听。听说我们是对中美合作所感兴趣的作家，他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他的新书，慷慨地送了我们每人一本。我扫了一眼书名：《解密红岩档案》。

接下来的话让我颇为意外。我问 L 关于中美合作所与两所监狱之间的关系。他说：“没有关系。过去搞混了。我们在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顿了一下。官方历史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改头换面了？我想问他关于之前发表过的无数和刚才说的相反的文字，但实在不好意思当面这样问。我于是问：“怎么搞混的，有意还是无意的？”

他也顿了一下，然后说：“无意的。”

我等着，但没有下文。

后来我翻阅了他的新书，出版于 2008 年 11 月。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些通俗故事，收录了小说《红岩》的相关历史人物的轶事。没有什么新内容，就是些我在别处读到过的。但在标题为“揭秘中美合作所”一章里，的确提到“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集中营无关。”就是说，349 页的书里，就这样一句话。

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我还是高兴不起来。一句话，轻松地翻转了历史，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更别提对过去的宣传文字和组织那些虚假展览有任何愧疚。

大概这是为什么 L 的书能够出版，并高票当选为重庆的“城市形象宣传大使”——薄书记在一次隆重的仪式上授予他这个称号。在总数 870 万张选票中，L 名列第三，位于围棋国手古力和钢琴家李云迪之后。宣传文字中没有说他们各自得到多少张选票。只说了 L 的功绩：“二十多年里，他带着‘红岩魂’展览走遍全国 383 个城市，在 308 次巡回中总共演出了上千场‘红岩魂’，感动了 560 万观众的心。”

当然，报道不会提任何虚假展览。我听圈里人说，比如一张“中美合作所狼犬舍”的黑白照片是在一个现今的犬舍拍的；“烈士的草帽”是从武汉买的；“烈士的床单”商标是近年的；有些“烈士的诗”是杜撰的……

这并不妨碍这些展览在商业上的成功，听说仅仅在北京的门票收入就超过千万人民币。

这就解释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结尾的一句奇文：“我们的确看到了这样一种奇特又激动人心的景象：无数当代中国人用金钱为红岩精神投下了诚挚的赞成票。”

见到 L 的一周前，我去了中美合作所展览馆。S 在门口等我。我最近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结识了她。她已不在展览馆工作，但还住在附近。

在大门口，我意外地发现这里不再卖票了——门票现在免费发放，参观者自愿领取。“这些门票只是为了进行统计，”S 说。她向我解释，从 2008 年起中央政府要求公共展览馆免费对参观者开放。“那之前我们是‘全国自筹经费模范展览馆’，”S 揶揄道。她对展览馆的商业计划很不以为然。

七年间第二次去那里，我能够看到变化，虽然展览内容常常自相矛盾。墙上的一段英文说明对中美合作所完全是正面评价：“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很大贡献”——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另外一面墙上依旧是中文的谴责：“‘中美合作所’是美蒋特务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司令部和大本营。”

在梅乐斯的住所，展览内容和七年前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仍然充斥着对所谓的中美合作所罪行的控诉。我开始拍照，一位馆员上前制止。“这些是要换掉的，”她说，“我们就是还没有来得及。”

从白公馆出来，S 和我商量下面去哪儿。这时一位热心的过路人插话进来给我们建议。

“渣滓洞！去看渣滓洞！我就去那儿，”这位四十出头的男人对我们说。我听出他的重庆口音，于是问他以前有没有来过。

“没有。第一次。”他解释说 he 小时候很调皮，他的学校每年都组织去参观，他每次都找借口逃掉，因为听说人人都得站在墓前低头默哀，他不喜欢。

“那为什么你现在要来？”

“这么有名的地方！毕竟还是要来看一下。重庆谁没听说过渣滓洞和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

“为什么说那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我试探着问。

“《红岩》里写的！你没读过《红岩》？”

“那是本小说，虚构的。”

“可那是历史小说，根据历史事实写的！”那人提高了嗓门，“我告诉你，渣滓洞和白公馆绝对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他把“绝对”两个字说得很重。

这时，一直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对话的 S 催我走。

“他们不会相信的，至少现在不会。”

喜读孙丹年新著《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

王川平

按：孙丹年著《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第一版。本文及后面赵、何二文均系为该书所作的序。但出版时均未用上。

几年前，一些被扭曲的历史信息呈爆炸状态流行时，我对孙丹年女士说：会有一位勇于澄清历史的人在应该的历史时刻出现。2011 年春天，当她把书稿《探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出版时更名为《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交到我手中并要我作序时，那份惊喜可想而知。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作为中美联合抗日的情报机构，它到底干了些什么，它与后来发生血案的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又是如何发生关系、产生如此巨大误解的，本书渐次展开论述，铺陈众多历史资料，从雾里海里把读者带回到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地方。作为读者，我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智气，此二气合在一起，就叫实事求是，就叫史事求是，就叫学术良知。有良知多好啊！

按照中美协定，对日作战结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立即结束。“蒋介石向美国要求延长中美情报合作，遭到美国最高当局即杜鲁门总统拒绝”；“1945 年 12 月，中美合作所进行会计结算”；“1946 年 10 月，中美合作所的最后一个美国人离开中国”（见书稿第 120—123 页）。既然如此，那以后的“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这其中的历史根源绝不简单。一是由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卷入了中国的内战，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二是在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同一空间，确实杀害了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三是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主任，与杀害许多共产党员的恶魔军统头子同为一人。四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反美反蒋的斗争需要，情绪使然。如果说新中国建国初期将中美合作所等同于“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派）罪行”尚可理解的话，那么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语却不能不发人深思。这不是用一句思想惯性、行为惯性可以解释的，尽管人们深知这种惯性的巨大力量。

其实历史也有许多偶然，许多无奈。就中美合作所总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后来被执政的国民党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军代表用来关押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包括“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这种历史的幽默，可能连孙丹

年也不曾知道吧。

当我同意写这个不成样子的“序”的时候，适逢欧美的炸弹正在利比亚土地上开花，本·拉登又被美国击毙，巴基斯坦正受困于与美国的情报合作问题。清理一下上个世纪40年代中美合作所短短四年的情报合作，或许还有更大的价值吧。我是这样以为的。不信，试试。

2011年5月

孙丹年的自我救赎 ——读《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

赵晓铃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那一片山麓下有一座人间魔窟。

那里没有阳光和花朵，只有满山荆棘，遍地虎狼。

那片山麓叫歌乐山，我们重庆长大的人很少想到那山原来的名字意味着快乐与歌唱。心里都有魔窟的浓浓的阴影，阴影下有清晰的“USA”的字样。

我们从记事起就被组织到那里参观，看阴森森的刑讯室，看沉重的铁镣手铐、带血的皮鞭和老虎凳、看灌进鼻腔的辣椒水，看钉进手指的竹签……回到学校还要开会谈感想，在课堂上还要写作文。

我们小小的心田就种下了仇恨，对于我来说，还有恐惧。

仇恨的对象不仅有国民党，还有美国人，我们亲眼看到，曾铐住烈士手腕的手铐上有“USA”字样。

与这片山麓有关的小说、电影、歌剧，写得真是好，演员也演得真是好。我特别喜欢那部具中西方音乐特色的歌剧的音乐。那些歌曲流行全国之前，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同学、江姐的儿子彭云拿到了歌单，得到了唱片，在学校里播放，在每一个班里教唱。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诵读、歌唱，一次又一次地激动，流泪。仇恨和恐惧便深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刻在我们的骨头里了。这样的血液铸造着我们的思想性格、气质教养、行为模式，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选择。

以后我做了老师，便复制自己受过的教育，领着学生去到那山下，把仇恨和恐惧的种子种进他们的心灵。回到学校，也指导学生写下仇恨的作文。

现在孙丹年写了一本书，说那座山下曾经有的那个机构是中国与美国合作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机关。虽说早些年我们已知道，杀人魔窟渣滓洞白公馆和中美合作所没有关系，与中国人杀害中国人的那些残酷和惨痛没有关系；但是，早年的教育毕竟进入了骨里血里。读了孙丹年的书才能比较彻底地知道，那个几乎影响我一生的传说不但是片面的，甚至是荒谬的。她的材料那样详尽，无可辩驳，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中美合作所对太平洋海战的巨大贡献，而是她讲述了梅乐斯和他带领的美国大兵在中国英勇卓绝的斗争和牺牲，他们的光荣与功勋一点不比他们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些战友差。而那个在我们的历史教育里臭名昭著的军统头子戴笠，也功不可没！

梅乐斯善于与中国人合作，在来华参加抗战的美国将军中，他最少对中国人的歧视。最令我惊讶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的游击部队。

我们看过了那么多电影电视，从来没有看到过江南的敌后游击队由操着英语的美国小伙子带领

着，拿着美式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只记得沙奶奶在《沙家浜》里骂“忠义救国军”是“不救中国救东洋，忠在哪里义在何方”！谁知那时候，竟有上千美国人活跃在江南的敌后游击战场！

梅乐斯和戴笠也去到那里，他们挨过日本人轰炸，还差点被汉奸暗杀。梅乐斯为保护中国翻译官受过伤，在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极度的紧张劳累中，他病得很严重，同时，这个单纯的美国人还要对付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尽管他后来被美国人误会，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误会了很多很多年，以至于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知道梅乐斯的贡献。但是他在晚年仍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段。他说：

不能使用共通的语言，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无论在文化背景，在军事传统，在政治演变等各方面都有这样大的差别，而居然能够顺利草拟出一个有关联合情报机构的设置方案……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都具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亟待完成的共同目标，那就是打垮日本鬼子！

相信这本书会让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读者心绪难平。

因为我们是非常奇特的一代，我们对灾难与屈辱熟视无睹，见惯不惊，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是“母亲打孩子”，是误会，是大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光荣的代价。

仇恨让我们充满戾气，我们会把一点点错误或是差异上升为矛盾和冲突，为了“政治的正确”，会毫不犹豫地践踏传承了千百年的优秀文明。“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我们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相，对于我们的上一代和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特别不了解。

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在能够思考的时代，我们的一生已过去了多半。

但是有一些人固执地要思考，要寻找真相。

孙丹年就是这样一个固执的人。

孙丹年的父亲孙铭勋是一位早年就追随革命，也追随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家，在 50 年代初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对待，他固执地不肯承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是错误。因此孙先生不但自己吃尽了苦头，也让妻子和女儿吃了苦头。

孙丹年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回到内地后就在重庆歌乐山下工作，这工作让她充满激情而又珍惜。然而，当她发现自己兢兢业业一字字写出的宣传材料并不真实时，她非常痛苦。为了生计，她不敢贸然放弃这份工作，但她终究是她父亲的固执的女儿，她最不可能放弃的是诚实。她做到副馆长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就要赶上评职称了，她说，高级职称，不评也罢。

歌乐山下的故事却选择了孙丹年。她不仅是不再撒谎，而且要寻找真相。

我和她是因为文学交往的，我读过她的小说，以我的专业眼光看，她的语言，她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对细节的捕捉，真的很有才华。

我问过她，怎么不写小说了？

她说：没有动力。

她别无选择地走向了历史。

孙丹年命中注定要写这样一本书，写这本书是她最好的自我救赎。

孙丹年认为，中美合作所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这或许不是一本最全面最权威的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著作，但我知道，这是一本可靠可读的书。

曾经受过的仇恨的残酷的教育，让寻求真相的过程，充满疑虑和恐惧，这是孙丹年的压力，也是动力。她说“胆怯地伸手，悚然扣问历史”，不是在海峡的这一边长大的中国人，不能体会这“胆怯”“悚然”背后的辛酸与心悸。“胆怯”“悚然”也让孙丹讲述她发现的历史，交代她的判断的时候，难免絮絮叨叨，一反她过去明快的语言风格。这就将作者探索真相的困难，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让读者一览无余。

这本书对于我的同代人来说，是珍贵的，对于受过与我相似的历史教育的上一代与下一代来说，是必须要读的。因为我们与孙丹年一样，需要再教育，需要一个自我的救赎。

2011-6-11

拨开迷雾还原真相 ——推荐《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

何 蜀

多年前，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在重庆举行了一次年会，我作为应邀列席参加者，在小组讨论中讲到了对中美合作所的评价问题，介绍了中美合作所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作出的贡献和后来被歪曲丑化为“法西斯集中营”的情况。听了我的发言，几个来自军事院校的学者面色沉重地表示：相信你说的史实都是真的，但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我们都是读《红岩》长大的。

这个表态让我惊讶，用今天的话来说也让我“无语”（作为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不从史实出发而从感情出发，而且是一部小说培养出来的感情），这也使我看到了长期以来一些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文艺宣传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之深。

对中美合作所历史真相的歪曲宣传，是从国民党政权逃离重庆之后就开始的。据我所知，最早把重庆渣滓洞看守所称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是1949年初从渣滓洞保释出来的当年的“进步青年”杨益言，他在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写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以“杨祖之”笔名在重庆《国民公报》副刊12月5日至16日连载。把渣滓洞与“中美合作所”联系起来并称之为集中营，这是杨益言的一个“创造”，因为当时从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生还的脱险志士（不论是保释出来的还是在大屠杀之夜冒险逃脱的）所写的回忆文章，都没有这样的提法。但是杨益言的这个说法符合当时反美宣传的需要，立即得到重视，并且在1950年1月中旬由罗广斌主持编印（杨益言参与校对）纪念烈士大会特刊时，赫然进入了刊名：《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在朝鲜战争开始后，随着反美宣传的升级，“蒋美特务”的提法又变成了“美蒋特务”）。此后，因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写的《在烈火中永生》成为畅销书，所谓“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说法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普遍认识”。当时共青团中央是把《在烈火中永生》作为“革命回忆录”向全体青少年推荐阅读的。可是，事实上《在烈火中永生》并非回忆录，而是罗、刘、杨三位共青团干部出于向青少年宣传革命烈士事迹的需要，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而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中的部分片断。这部文学作品后来经过反复修改，书名曾定为《禁锢的世界》、《禁锢的世界》，始终觉得不理想，临正式出版印刷时才定名为《红岩》。

从《在烈火中永生》到小说《红岩》，再到根据《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这些文艺作品都把中美合作所写成了一个专门镇压共产党人的法西斯集中营，一个“杀人魔窟”。这比后来的“戏说历史”更加可怕，因为它不是“戏说”而是严肃的“正说”，这就使得许多人（几乎是整整一代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辈）都被灌输了错误的历史知识：反法西斯的盟国军事情报机构被说成了法西斯集中营。白说成了黑。

了解这一段历史就可以知道，要从史实上澄清真相，恢复中美合作所历史的本来面目，需要做多么艰苦的工作。

孙丹年的这本书，就承担着这样的重任。令人欣喜的是，孙丹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因为她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她曾任歌乐山烈士陵园编研室主任，不但了解整个歌乐山烈士陵园所有烈士的情况及其相关的历史（包括原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及受到牵连的中美合作所的历史），还认真查阅了相关的大量资料，特别是烈士陵园所收存的B类（敌特）档案，在那些几乎无人问津的“故纸堆”中潜心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阅读，作了大量的笔记，从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

我是在为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做编辑时认识孙丹年的。她那时正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从事编研工作，给我们写了不少稿件，是我们杂志所收到的来稿中质量上乘的，基本上是每稿必用。她的稿件文思清晰，文笔清丽，一手钢笔字也很漂亮（九十年代初还没开始用电脑写作），而且，她总是能从一些早已被人们写过不知多少遍的老题材中找到新的角度，发掘出新的细节，加上新的思考，写出新意来。

孙丹年这本书是她退休之后进行的一项大工程，一项独立完成的很有意义的工程。它告诉人们：历史是有真相的，真相是不可能长久被歪曲、屏蔽的，不论是出于商业目的嬉皮笑脸的“戏说”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慷慨激昂的“正说”，真相始终只有一个。在这片领域里，总有一些不问个人得失只求还原真相的义工在默默操劳着，孙丹年就是其中令人钦佩的一个。愿她的这本书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喜欢，不仅使他们得到一些真实的有价值的知识，而且能启发他们的有益的思考。

2011年5月22日于重庆风江阁

反右运动是毛氏执政的最大败笔之一 ——反右 55 周年祭

倪艮山

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毛氏独裁专制下，一贯敌视知识分子。初始把知识分子定为小资产阶级，批判其有软弱性、动摇性、两面性，从来对其怀疑、不予信任，并作为改造对象。待国际上出现了波匈事件，毛氏决心先下手为强，阴谋设计定局。利用党的整风运动，动员鸣放，诱鱼上钩，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一网打尽。从此全国知识分子深陷炼狱、苦海。

本来党要整风，干非党群众屁事，但铁定“邀请”民主党派与非党知识分子参加。开会时，有人未到，要等或电催，似乎已有内定重点目标，极需其鸣放，出材料。因有反胡风和肃反的教训，人们早已觳觫惊悚。鸣放会上，大家左顾右盼，疑虑重重。主持会的党领导，再三强调、保证：“要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鸣放者“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待鸣放材料到手，立马变脸，由整风转为反右斗争。并唯心主义地预设 5% 的划右指标。对群众所提意见，或断章取义；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深文周纳，罗织莫须有罪名；上纲上线，作为向党猖狂进攻。组织火力，进行所谓批判、辩论，“说理斗争”。同时铺天盖地张贴大字报、漫画。要把右派批倒批臭、批得体无完肤。用威逼诱导，使被批判者自己承认是右派分子。然后定性、戴帽，欢呼揪出了右派分子的重大胜利。有的单位划右人数超过 5%，甚至达百分之十几；有的不足 5%，还得补课凑数完成；有的人因此成为“凑数右派”。如果领导抓不出右派或反右不积极，就把该领导划为右派。

反右后期，党中央颁布处理右派的六条标准。由党的“整风领导小组”，对所划的右派分子，宣布惩处。称右派就是“反革命派”。或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或撤职、降职，或流放、劳教、劳改，或监督劳动；有的降四、五级工资，有的只发给一、二十元生活费；有的被捕下狱；有的被处决；有的党头丧心病狂地唆使、逼迫家属划清界限、离婚；有的亲友受到株连影响，调动岗位或下放；有的家庭被划了几名右派；有的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毛氏对右派处理出手狠重，残酷无情；似乎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言贾祸，无辜被惩，毛氏一伙实属罪深孽重。实践再次证明，毛氏及其追随者对知识分子的极端敌视。

这场反右斗争，包括反右补课、交心，以及划“中右”等等，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三百多万人。另有文化较低者划为坏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忘本分子，等等。全国的知识精英，一网打尽。很多右派死于流放、劳教、劳改，如夹边沟、北大荒、团河农场等处，无数死者弃尸荒野沙丘，惨不忍睹。众多有为志士，虽侥幸生还，然而青春划右，斑白改正，不啻毁其一生。从此箝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巴，三缄其口，万马齐喑。毛氏及其追随者可以为所欲为，直至无法无天。反右为大跃进、文革开辟了道路。反右不仅使知识分子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更使国家的科教文化事业和民族元气，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场反右斗争，使毛氏及其追随者，彻底暴露了谎骗欺诈的可耻嘴脸和流氓本质。从此毛氏一伙诚信扫地，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我国古代的专制皇帝，还懂得爱民如子，体恤百姓。从未听说皇帝谎骗欺诈老百姓，故设圈套，使其上当获罪者。可见毛氏一伙毫无人性，连古代皇帝都不如。

反右斗争，完全由毛氏一伙发动、组织、推进和完成。虽然打出“整风领导小组”的名义，却是不折不扣的党的行为。政党不过是个政治组织，只能对党内发号施令，约束其党员。对党外群众无权过问，更无权惩处。中共与民盟等民主党派是平等的政党组织。中共无权干预过问民主党派的内务，更无权赤膊上阵、直接惩处他党成员。非党群众与民主党派成员的职务任免、工资升降，均应由其行政机关处理；触犯法律，应交司法部门审判。这是起码的常识。哪能由中共越俎代庖、一手包办。反右运动，始终由中共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实属无法无天。事实证明，1957 年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是讲了真话实话，一语中的。而储先生竟以此获罪，不知所终；岂非千古奇冤！

反右运动，是执政党利用手中权力，搞的阴谋诡计，是根本错误的。文革后拨乱反正，除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等六人外，其余 99.99% 都承认属于错划，给予改正。由于邓小平是当年中央反右组长，拒不反省、承认错误；坚持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因此留下几个人作为反右的必要依据。哪有扩大化至几十万倍的道理？当政的衮衮诸公，不觉得荒谬

绝伦吗！

最不可宽恕的是，不给右派彻底平反，不补发反右错扣的工资，不赔偿右派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失。既然承认反右错划了，当然所扣工资是错扣的，应如数补发、退回。不补不退，错扣右派的工资，弄到哪里去了？堂堂正正的执政党，应该光明磊落。错了，要勇于担当，勇于正视、纠正错误，才能得到人民信服、拥护。如果面对右派的千呼万唤，装聋作哑，不予置理，连“欠债还钱”的天经地义都不能坚守，这将使执政党的威信形同敝屣。如此，与流氓无赖何异？财力不足吗？我国每年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旅游、公款豪赌；与民生无关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大把撒钱“援助”非、亚、拉国家；超过国防支出的维稳经费等；不知要几万亿！哪能就缺该还右派的那点钱呢！德国对二战时期纳粹党迫害犹太人的罪行，都认真道歉、赎罪，彻底赔偿；台湾当局，对蒋公执政时期 2.28 事件的受难者，彻底清理，认真做了赔偿。不仅未损其威望，还得到各国赞赏和尊重。中共从开国至今，一直执政六十多年，对自身所作所为，应负责到底，责无旁贷。而且不是对外族，是对自己整错的同胞，毫无回避、推脱、搪塞的道理。难道堂堂执政大党的掌门人，还赶不上德国的默克尔和台湾的马英九吗！扪心自问，有无愧疚？！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悲剧；它创历史之最，世界之最。不容讳言，反右运动是毛氏一伙执政的最大败笔之一。这是因为：

1，反右的性质是极其恶劣的。它是毛氏一伙为巩固统治，敌视知识分子而采取的谋略；企图使知识分子匍匐在地，甘当驯服工具；首先把知识分子中思想敏锐、有真知灼见的精英干掉。

18

2，反右的手段是极其卑鄙的；它耍阴谋诡计，故设圈套、诱骗知识分子落入陷阱。

3，反右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把全国的知识精英一网打尽，国家多年培养的专家学者、积累的人才毁损殆尽；使三百多万右派及其亲属几千万人堕入苦难深渊，极大地斲伤了民族元气。

4，反右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使“士”作为忧国忧民、直言敢谏的阶层，被撕成碎片，不复存在；从此知识分子封口噤声；人们力求油嘴滑头，不再敢讲真话实话；学会违心处世，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实事求是之风荡然无存。社会上只闻歌德颂扬之声，谄佞虚伪风气盛行，一发而不可收拾。

反右运动已过去 55 年了，但是问题远未结束。对右派平反，赔礼道歉，补退错扣工资，赔偿经济、精神损失等，尚待解决。也必须解决。迟早会解决。对反右运动的探讨研究，方兴未艾。以武宜三先生为首的香港五七学社建立有年，全方位地开展有关反右运动历史资料收集、研究、编辑、出版；做出可贵贡献。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创建“五七年学”，正在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南大的陈远焕先生，从事“五七”方面资料搜集工作，也有长足进展。有关的山寨出版物《往事微痕》、《巴山夜雨》、《黑五类忆旧》，都拥有广大读者。等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局把反右列为言谈、出版、研究禁区；妄图捂盖篡改历史，不仅可耻，也是枉费心机。可以预见，反右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特别重大事件，专家学者对其探讨研究，必将结出丰硕成果。国人正拭目以待。

May 9,2012

略谈反右运动对民族道德伦理的摧折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各位前辈、各位参会代表你们好，

我是生长在重庆的右二代，名叫谭松。我父亲谭显殷 1957 年是重庆市团市委宣传部长，他因言获罪后下放到重庆长寿湖劳动改造，那一年我两岁。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妹妹饿死，外婆上吊自杀，我从小就目睹和经历了一幕幕苦难和不幸。

多年之后，2001 年，我偶然遇到父亲当年长寿湖的右派难友，当看到他衰老的面容和病弱的身体时，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要把右派老人们的经历记录下来，他们来日不多了，要抢救那段历史。这既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更是为了不能重复的悲剧——因为，苦难如果被遗忘、悲剧如果不能被吸取为教训，那么，那些苦难和悲剧才是白白地发生和经受了。

于是，2001 年 4 月，我放弃了工作，专门进行右派采访。当时，我没料到，做这件事会是这么艰难、这么坎坷，还会花这么长时间——从 2001 年到 2011 年《长寿湖》一书在美国出版，整整过了十年。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原来 55 年前的那场运动，可以如此这般地践踏人类文明社会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可以如此这般地违反人的最基本人权。虽然我本人是右二代，不乏对苦难的目睹和经历，但 1957 年的荒唐、残暴及其造成的个人苦难和民族灾难仍然让我悲愤难抑，同时，也让我沉思浩叹。

对上百名右派老人的采访，我不仅仅看到了一个政权对无辜个体和民族精英的残酷迫害，更看到了这场亘古罕见的迫害是如何摧折了我们民族传承数千年的道德伦理，所以，我这次为 55 周年会议提供的文章就是“略谈反右运动对民族道德伦理的摧折”（这儿要说明一下的是，这不是一篇论文，没有什么理论论述，而只是我从采访的事例和感受出发，指出反右运动摧折了道德的历史事实和它对我们现在社会生态的影响）。

19

下面我简单就此作一点阐述：

一，“引蛇出洞”的“阳谋”手段，使谎言和欺骗在中华大地上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人无信不立，这是我们传承数千年的古老道德，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可是，1957 年不同了，诱骗、欺诈、谎言，被当作“引蛇出洞”的伟大韬略。当局诱使人们说真话，不说是对党不忠，并且信誓旦旦保证：“言者无罪”。可是，转眼，当局就据言定罪，整得言者家破人亡。

从此，人们不再敢说真话。谎言，成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

所以我说，1957 年，数得出的是 55 万多知识分子家破人亡，数不出的是整整一个民族开始大步走向谎言。

自 1957 年起，真话，完全成了危险的同义词；假话，成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从此，我们的心理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说假话时心安理得，说真话时心慌意乱。

二，反右运动剿杀了人性中一个最重要的美德——正义感和同情心。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正义感和同情心，这是做人的根本。可是，1957 年，这一根本受到毁灭性摧毁。我在采访右派中发现，有不少右派之所以遭难就是因为他们坚守了人之为人的这一根本。

长寿湖右派陈英（重庆市城建校教师，2008 年初去世），1957 年坚守良知，拒不编造谎言揭发同事，结果被打成右派，导致家破人亡。

长寿湖右派李春华（川江航道整治处技术员），1957 年坚持实事求是，不按上司意图诬陷他人，

结局是被关押折磨，再加 22 年“劳动改造”，留下终身后遗症。

同样遭遇的还有因正义感仗义执言而被打成右派的白永康（重庆五一技校，2002 年初去世）和李恩章（重庆五一技校）；因怀不忍之心同情右派而被打成右派的赵子生（重庆市煤矿学校）等等。

而与此同时，凡是昧着良心，害人整人的奸诈暴虐之徒，则大得嘉奖、深受宠幸，一个个入党、升官、发财。例如，当年诬陷李春华“连毛主席都骂”的人，反右结束后马上升官当了段长。又如，1957 年不遗余力陷害话剧团李文书等忠良之士的人，受到大力提拔，官至副院长。

中华数千年历史长河里，有哪一个朝代曾如此旗帜鲜明地惩善扬恶？

人类悠久的文明史上，有哪一个民族曾如此威烈浩荡地扬恶惩善？

说到此，又想起刚刚发生的毒胶囊事件。

在 1949 年前“黑暗的旧社会”里，中国没有层层叠叠的质量监督局、药品食品监管所、工程监理所、工商管理局……同时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假酒假药、毒奶粉毒胶囊、刚竣工就垮塌的大桥、吞噬了无数生命的“豆腐渣”校舍……

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为什么只有现在才产生这样如洪水般的假冒伪劣？

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注重道德伦理、强调“人无信不立”的古老民族变成了一个不以造假为耻，而以说谎为荣的泱泱大国？

追究其源头，是否可从 1957 年那横空出世的鬼怪名词——“阳谋”——开始？

我想，1949 年之后，一波又一波的惩善扬恶运动，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谎言体系，眼下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只是这套体系的物质体现形式。

我在《长寿湖》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这个“新社会”，用暴力和谎言在短短几十年里，将数千年的文明和道德摧毁得干干净净，建立起一个巍峨的权力祭坛。奉献在这个祭坛上的，是无数无辜的生命和被败坏了的人心。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父辈们即将先后在人生的舞台上谢幕，我们右二代们应当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一种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要求彻底平反 57 年、进行经济上的赔偿、还原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担负起重建被摧折的道德的重任——我们无数在 55 年前被“摧折”的前辈已经给我们竖立了榜样，让我们仰望他们，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进行我们的使命！

谢谢大家！

2012 年 6 月 10 日

（谭松的书面发言已在香港的研讨会上宣读。）

魂断于家岭

赵文滔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伤害》。作者原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被打成“极右分子”。）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死亡与复活。

——罗曼·罗兰

就在一日三餐的质量、数量每况愈下之际，三分场突然接到命令，除了极少数留下外，其余大多

数“右派分子”立即迁往茶淀农场的于家岭分场。

我们这一群“右派分子”匆匆收拾好行李，当天从茶淀农场三分场开拔，跑了二十多里路，等到临近于家岭才发现，所谓于家岭原来是一马平川，周围并没有山的影子，哪里来的什么“岭”呢？大家只顾匆匆行进，情绪低落，我不由得想道：我们要在平原登上一个名不副实的所谓“岭”，这是否不祥之兆？

来到于家岭，第一印象就使得我们的情绪陷入了迷惘和低沉。首先，它不像三分场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更让人沮丧的是，这里也有高高的围墙，围墙上也安着电网。四角岗楼上日夜有荷枪实弹的警卫。这景象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处理“右派”关押我们的第一站——北京半步桥的第一监狱。有人立刻七嘴八舌地感慨起来：

“我们是不是越改造越改回去了？又来电网了，武装警察也来了。这叫什么事儿？”

“围墙里只差一点儿没架机关枪！”

“该不会又来一回逮捕吧？”

“这么改造下去，还改造个什么劲儿呢？”

“本来给你圈起来就是‘无期’，不是吗？”

“教养哪儿有期？大概这一辈子就要这样没完没了折腾下去了？”

“谁知道呢？这形势谁能看出来？”

“怎么一看到这岗楼，就使我联想起抗战时期，日本鬼子修的那些可怕的炮楼了。”

“嗨！别胡说八道了，这种玩笑千万开不得！”

“——”

尽管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总的感觉是不如三分场。但是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一来竟然是走进了生死场。

一进入围墙，就把我们打乱重新分组。先头已经调来一个流氓队，像掺沙子般地掺到“右派”组里。二十人编成一组，分住在两间房里。所谓“流氓队”，原本是社会上因为打架、斗殴、小偷、被送来劳动教养的人。在处理“右派”的后期，彭真又提出个“水晶球”政策，要把北京清理得如水晶球一样的剔透净洁。于是，庙里的和尚，清真寺的阿訇，教会的神父，开小人书铺的，起义的旧军官、个体小摊贩、在家自己谋生的……凡是街道积极分子说有问题，没在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工作的人，全送来教养了。

监管我们的队长也换了。好像都来自军队。一位姓李，山西人，体质不错，五大三粗，红光满面。另一个姓高，东北人，个头不高。平时他们也常常大声训斥人，但在实际劳动和生活中对人还是比较好的。

我和张睿作组长，他和九个人住一间房，我和另外九个人住在另一间。张睿长我九岁，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系毕业，为人忠厚、诚实，是标准的老知识分子。解放前他从北京跑到河北张家口解放区，又从张家口进入北京。而后，在北京统计局担任处长。整风时，他给他的领导提了点意见，被打成极右，送到这里被劳动教养。他人品厚道，我们处得挺好，更为可贵的是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后来。在三分场就在同一组的张志华、安树大等还在同一组，新添了流氓队的几个人。

来到这里，伙食质量进一步下降，每顿饭只有三个乒乓球大小的白薯面窝窝头。这种窝头黑不溜

秋，有一定的韧性，掉在地上能够弹起来。一开始，劳动也还可以，半个月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许多人感到疲乏无力，力不从心，心慌意乱，不能正常休息，劳动效率逐步下降。以致有些原来劳动好的人，也被队长训斥是“磨洋工”。

因为我们队的统计员朱振寰留在三分场，队长让我作起了统计员（统计员的工作是每天跟着大家出工，统计每人的劳动量，根据劳动量，计算出每人的月工资，不参加劳动）。过了不久，大家情绪低落，我发现比起刚来时，劳动量可说是一天不如一天。人人都很少讲话，情绪低落。尽管队长在地里走来走去，不时高声喊着：

“改造了快两年了，还不好好劳动啊？你们想干什么？干活！干活！”

“谁完不成定额，谁留在工地别回去！”

“你们就泡蘑菇吧，谁泡谁就别回去！”

“——”

话虽然那样讲，天黑了队长也得回去。大家只不过比较晚点回去罢了。

后来队长实行了“扣窝头”的办法，（这办法可能是场部统一规定的），谁完不成定额，扣谁的窝头。这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作法，本来许多人就吃不饱，已经出现了人人消瘦的情况，大多数人肯定完不成定额，把不少主要劳动力的窝头扣掉，必然使这部分人的劳动效率日趋下降。又吃不饱，又扣掉窝头，更得挨饿。长期吃不饱，大家已经损伤了身体，再要减量岂不是要命？

有一个时期，收工回来，队伍拉得很长，走在最后边的比走在最前边的相差几乎一、二里地。实际上队长也知道大家吃不饱，身体支持不了，并不是大家不好好劳动，不过出于他的职责，他违心地虚张声势地喊着：

“快走，快走，干活不卖力气，回家也不卖力气呀！呵？”

“你们还吃饭不吃了？”

“回家也泡蘑菇啊！？ ”

“……”

他喊一阵不起任何作用的废话，大家该走多快还走多快，并没有因为他喊而加快脚步，没有人理睬他。他也明白大家都饿得变了样，人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这样，并不是大家消极怠工。他大概也知道眼前的这批“右派分子”已经快成了饿殍。经常在收工回来的路上，他匆匆对我说：“你跟在后面，催着他们快点走。”他则步履轻捷地赶到队伍前边，带着前面的队伍赶回农场。

有一天，我在后面和拉在队伍后面的难友一道走着，一边聊天，一边对他们说：

“赶快回去洗洗脸，吃过饭还可以休息一会儿，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路上，这样晃晃悠悠回去，饭也凉了，又休息不好，这是何苦来呢？”

一位从前和我在三分场同组的黄铁华（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北京师大调干生）对我说：“唉，老赵啊，我们相处快两年了，彼此关系不错，我给你说句实话吧，谁不愿意早点儿回去？知道吗？我们已经四个月没吃过饱饭了，四个月了啊！天天挨饿，怎么受得了呀？你现在不干活，体会不深。明天你来我干活的地方看看，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有意识的到黄铁华干活的地方多呆了一会儿。那天正好是拔秧，于家岭的早春时节清晨还比较冷，八点多钟开始，在结有一层薄冰茬的水里拔秧。秧苗很短，大家的身体已大不如前，长

时间弯着腰受不了，为了赶进度，只好跪在水里干活，下半身全泡在冰冷的水里。饿着肚子就这样干一天，也真够难为他们的。况且，劳动仍然有基本定额，完不成定额，就得扣窝头。三个乒乓球大的窝头本来就吃不饱，再扣掉一个、两个，那就更得饿瘪肚子了。越是扣窝头，越是吃不饱，越吃不饱，越完不成定额。也越发成了恶性循环。饿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可以，已经四个月了，谁受得了？看了黄铁华的现场劳动，我很心酸，大家并不是不好好劳动，而是饿着肚子，的确确实干不动了啊！我所以体会不深，是因为一段时间我并没有真正劳动，比起他们来，体力消耗得慢一些。及至看了黄铁华的劳动，我才真正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

过了一段时间，每天收工回来，走在队伍后边的掉队者越来越多，后来几乎达到全队的五分之二。有时甚至达到一半，或者五分之三。他们晃晃悠悠挪动着疲惫不堪的脚步，一瘸一拐地走着。以往，大家在路上还说说笑笑，可现在却很少有人讲话。当时谁也没有镜子，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但是我从别人的脸上明显地看出，他们大都面如菜色，浮肿出了眼泡，眼袋下垂，脸肿得变了形，象面包似的，完全是一种病态的样子。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改造者，每天只是默默地劳动，不敢有任何议论。谁都深切地了解这是大跃进狂热，毁掉成熟的小麦，盲目推行旱地改水田，把一年的收成全泡了汤的结果。而我们是因说了几句真话获罪的“右派”，现在面临的是全国都在“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在这种大环境下，谁又敢说什么呢？具体到我们目前的处境，大家的心情真所谓：“心非草木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然而有的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来自“流氓队”的人讲话却比我们随便。我们组有一个杜兴昆，原本是北京西苑的农民。五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所在的政务院（今国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就住在西苑。那一带很富足，一家几口，有两、三亩地种水稻就够吃饭的，大部分时间是农闲。一般农民都在小街开一个小店，或洗衣服，或卖零食。冬天还可以把收完稻子的地里灌上水，结成冰以后，租给附近学校的学生作滑冰场赚钱。杜兴昆就是在西苑小街开一片小洗衣店。按理说，他种两亩京西稻，一家人一年四季准够吃，开个小店也不缺钱花，应该说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此人的特点是脾气不好，和人交往时，一点小事也能和人家吵起架来。他就是因为和人吵架吵得被劳动教养的。他没什么文化，遇到什么事他都满不在乎，用北京土话说叫做凡事都“满不愔”。

已经有几次了，在工地他不干活，坐在土埕上“捲大炮”。有一天，终于被李队长看到了，马上气冲冲地喊他：

“杜兴昆！杜兴昆！你不干活干什么？你过来！”

杜兴昆慢腾腾站起来，铁锹也不扛着，而是夹在胳肢窝，两只手揣在袖筒里，架着铁头，晃悠悠走过来。他的长相还很有意思，一头自来卷儿头发，两道浓眉长得几乎成了一条直线似的连在一起，鹰钩鼻子，真有几分卓别林的样子。一付沙哑的嗓音，满不在乎地冲着李队长说：

“干嘛呀，干嘛呀，你嚷嚷什么？我今儿个在道儿上捡了一个烟屁，刚在那儿搓了点儿草末子，想捲个炮，缓口气儿，您这就嚷嚷上啦。干嘛呀！人总得缓口气儿吧。我昨儿个憋了一泡尿，我怕饿，憋到今儿都没敢拉。我要拉了，肚子更空啦！人站着就想拉，可不就得坐着忍会儿嘛。”

“胡说八道！你油嘴滑舌！刚坐在那儿？我早就看见了，贼鬼溜滑的你！”队长也知道和他纠缠得时间长了，他是什么话也搭得出来的。训了杜几句，队长就走了。

队长刚走开，说不定还能听到他的骂声，杜兴昆就发起了牢骚：“操你大爷！你丫管的事也忒多，

管天管地，你还管人拉屎放屁！”

张志华压低嗓门儿对我说：“哎！这位农民老二哥可真算是个人物啊！我看队长拿他也没办法。”一边说，一边和我笑。

“你笑什么呀！可不嘛，你不饿呀？是不是呀？”杜兴昆冲着张志华打开了话匣子。

“你这位农民老二哥还蛮风趣的啊。”张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聊上了。

“什么叫风趣？”

“就是挺逗的。”我给杜解释说。

“嗨！您别叫我老二哥，我这阵儿是他妈蔫儿了的老二，都他妈站不起来啦！”

“你怎么就进来了？”张问他。

“我他妈和人拌了几句嘴。”

“好像谁说你是和人打架的。”张说。

“别操蛋啦，那叫他妈狗带嚼子——胡勒！嗨！甭提他妈这挡子事啦，一提这事，我能气得背过气去。操他大爷的，我不就是和人拌了几句嘴吗？有什么呀？你们学生不就是多说了几句话嘛。我知道，我们家离你们北大不远。操他大爷的，上他妈哪儿讲理去？再说啦，你把我们圈进来，要枪毙，要杀要剐，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嘿——，他给你来个不给你吃饱还叫你干活，往死里饿你，哪个缺了八辈子德的主儿想出来的这损招儿？真他妈缺德带冒烟儿，我操他八辈儿祖宗！他们家孩子准没屁眼儿。见天见饿着肚子我他妈都快前心贴后心啦，还嚷嚷着让干活，我干得动吗？我们见天吃什么？他们丫挺的（北京骂人的土话，丫挺是‘丫头养的’的略音，有时可略为‘丫’一个字）吃什么？噢！横着他们丫是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什么事这叫？……”

“快啦！下午干完活儿，回去又可以喝那碗马齿菜汤了。”张志华说。

没想到他这句话又引来农民老二哥的不同意见：“我说，我说，我说你们这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怎么一阵儿一阵儿净犯糊涂呀？那玩意儿是菜吗？当他妈猪食都不是好料！那是野草，那是菜吗？你们也不想一想，是菜，怎么没人种呀？是不是呀！你说叫我怎么说你们是好。人告你说，自来水比桔汁还甜，你也信？嘁！那叫胡咧咧！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儿……”

张志华没敢再和他深说，回过头对我说：“这农民老二哥还真有意思，倒是个写小说的典型素材。”

“他这农民和一般乡下农民不一样。西苑小街紧挨颐和园，西苑大院解放前是宋哲元的兵营。解放后是华大、革大所在地，后来又是华北行政委员会、外语学院。颐和园旁边是马列学院，离你们北大也很近。他是在这种圈子里的少数农民，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油滑？”杜兴昆走开后我和张志华聊着。

“他的语言倒蛮有意思。”张说。

“但愿你将来能写成小说，有选择地吸收取舍些这位农民老二哥的语言。”我心想，张志华从福建泉州考上北大，整天在学校圈子里，他哪儿听过这些北京土话？况且杜说的还有一些劳动农民的习惯语。

两个月中，伙食不断地恶化，三个白薯面小窝头，变成了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加野菜的粥。接着，不知道是谁发明了“代食品”，把若干年前脱完粒当垃圾扔掉的陈旧玉米芯，用机器磨碎再炒一下，加在白薯面里。这种东西有点像泡沫塑料的颗粒，放在嘴里，软而嚼不烂，韧性很强。有一定粘

度的白薯面，和这种东西还不容易粘合在一起。蒸出来的窝头松松散散，个头虽稍大一点，实际上是“假货”，只能起一点撑大肚子的作用。其实这“代食品”是一种“心理食品”，从嘴里吃下去，经过整个消化系统，在肠胃里转一圈，只是刺激了一下食欲神经，最后又把这泡沫拉出来，根本就不能吸收，拉出来的还是泡沫塑料差不多的玩意儿。不过，把若干年前的棒子芯能翻腾出来，这种不寻常的作法，倒暴露了粮食的确出现了严重危机的真相。大家想法很多，但是都不敢说出来。

收工回来拉在后边的人更多了。原来浮肿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发肿的脸，在最近一个时期，不知不觉中又瘦得变了形。脸上只剩下干瘪褶皱的一层皮，真的是槁项黄馘，好像不知道风干了多久的皱巴巴的土豆皮，全又成了苍老了许多年的样子。那可怕的样子简直找不出来相似的人形。（若干年后，改革开放了，我在北京看一个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看到奥斯维辛的景象，忽然我发现了曾经熟悉的身影。我不知道那些骨瘦如柴的群众演员是从哪儿找的，当时要拍这个电影的话，我们这帮在于家岭劳教的“右派分子”应该是最形象最好的群众演员了）那时候，我也浮肿了，走起路来两条腿直发飘，不听使唤，好像失掉了一部分知觉，也成了掉队者的成员。

有一天走在路上，在三分场时曾在—组的小佟走过来。好久没见他了，他叫佟信顺，从北京石景山一个好像是冶金中等专业学校的单位被发落到农场劳动教养的。刚到半步桥时我就和他在一起，他实足年龄才16岁。从一到农场我们同组同屋了将近两年。因为他小，是个孩子，具有城边接近乡村地区孩子的特点，邋邋遢遢，不拘小节，所以大家常照顾他。听说他的罪行是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询问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施行的。这封信当然不会寄到美国，而是从邮筒转悠到了学校书记的手中。书记立刻跳了起来：“好！光凭你给我们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写信，就能定你个‘极右分子’！”于是就把这个16岁的少年，以“极右分子”的罪名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了。经过两年的劳动改造，如今18岁了，刚刚算进入成年。虽然算成年，也许是营养条件不好，但个头儿还是那么矮小，脸庞消瘦，那几大片少年青春癣好像又有了发展，显得颧骨高高隆起，形容枯槁，又显然不像已经18岁的成年人。他有结巴的毛病，凑到我身旁轻轻抽泣着对我说：“我——我——我天——天天吃不饱，晚上饿得睡——睡——睡不着。我——我……”见他这样子，我赶忙说：“不要哭，不要哭，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家都一样，忍耐点，没别的办法。千万不要乱说话，记住，千万不能再乱说话！”他点点头，慢慢拉在队伍后边，又独自晃晃悠悠踉踉而行。忽然，我下意识地觉得小佟很可能精神有点承受不住了。这个18岁的孩子，好像15、16岁没发育成熟的样子，可以想到，他从孩提到少年，都有父母养育关爱他，没有挨过饿。如今怎么连饭也吃不饱了？怎么走也走不动了？朦胧中他可能意识到这样下去人是会死的，如果继续这样挨饿的话。

大家熬到初冬，终于开始死人了。没想到，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死的竟是曾在三分场同组的李老头，李志军。他说过，他是石景山税务局的小职员，山东人，家有妻子儿女，生活困难。他是因为在旧社会工作过，反右快结束时，单位“右派”比例不高，为了超额，把他给“找补”上的。所以他在我们来后，已过了三、四个月才来。来农场时，穿着一件不合体的小棉袄，里边只有一件单衬衫，风可以从短小瘦窄的下摆直吹腹背，所以常常腰间系一根草绳，以求保暖。穿一双家作的布鞋，也是破烂不堪。因为袖子很短，初冬时分，手腕上已经开裂了密密麻麻的小血口子。老头真格是衣衫褴褛，憨态可怜。他干起活来非常卖力，相对说来，像他这样长期挨饿“入不敷出”，极度缺乏营养的人，再加那身无法御寒的衣着，确实很难熬过这种饥饿而寒冷的严冬。没想到进入初冬，死神就把他招去了西天。那

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一组，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他们组几个人从房间抬出一个破席卷，放在一辆用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时遗留下来的炮车改装的牛车上，将要拉走。他们组一位难友低声说：

“是老李，中午我们收工回来，他已经在宿舍去世了。”

那架破车上，只有一张破席卷着老李。后来听说这张破席，把死人送到乱坟岗子，死人滚进坑穴，破席还要拿回来再卷别的死人。于家岭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他没有穿袜子，也许他就没有袜子，脏兮兮的脚露在破席卷外边，那双破鞋早已不知去向，脚后跟黑乎乎的两只脚，随着车身的震动，僵直地互相磕碰着。

在管教极严的大墙里，是不允许聚众对死者作什么表示的，我装着到食堂去打水的样子，跟在“殡车”旁走了十几步，目送着那辆“殡车”，两个纯铁轱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慢慢地远去了。看着这种情况，酸楚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充盈了我的眼眶。这大抵也是人之常情吧！老李走了，他有多大罪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憨厚的老头。难道他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他有什么罪过？是谁又是怎样决定采取如此残酷的刑罚的？而今就用这种方式让他脱胎换骨去了？他的妻子和儿女将如何生活下去？谁知道呢？又有谁去管呢？

有人在劳动的半路遇到别的分场的人，听说我们离开三分场，从东北兴凯湖来了另一批“右派”。因为那时候中苏已经交恶，只是没有公开。中苏一交恶，当局就把我们这些“假想敌”往坏处想，认为兴凯湖的“右派”必然会“叛逃”，往苏联跑。为了防备这批地处中苏边境的“右派”叛逃，所以把兴凯湖的右派迁到茶淀，他们到了三分场，我们才迁到于家岭。

说实在的，把我们这些只是提了点意见的人，通通当成“敌我矛盾”，已经属于含冤负屈，落到如此境地，现在看来对我们这些“右派”不赐以“萧斧”，大概是解不了气的。有时候想想也觉得可笑，这些决策人是不是患有精神病？把我们想得那么反动的根据是什么？我觉得很可笑，然而精神病患者的当权者却是认真的。有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一窝精神病，难道你就能说清？

这会不会就是我们这群“右派分子”未来前途的开始？

面对这一情景，出现了人心惶惶，劳动很不正常的情况。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不敢言说的恐怖之中了。

死人的事情在不断发生。首当其冲的是壮年和老年。壮年都是年青的小伙子，他们体力好，是劳动的主力。但饭量也大。在大跃进旱地改水田的劳动中，他们大放卫星，可那时候一顿饭他们能吃五、六个大窝头。米饭能吃三、四碗。现在突然变成乒乓球大小的窝头，四个未必能相当于原来的一个，而且数量还在一步步减少，毫无疑问，发热量也大大降低。白薯面又变成“代食品”，进而变成每人每天二两玉米面，其余都是野菜——马齿苋。三顿饭就仗这二两玉米面，根本把马齿苋粘合不到一起。起先，还上笼蒸，想蒸成野菜窝头，不料蒸出来的是一滩糊糊，炊事员只能用铲子刮起一滩糊状的玩意儿，拽到打饭人的饭盆里。在这对于数量斤斤计较的特殊时期，极易引起野菜糊糊多少的争执。后来只能是作成粥，用舀子发粥。从五、六个大窝头逐渐减少到每顿不足一两玉米面，其余都是野菜，这种状况竟然延续了半年多。大家一方面承受不了这种从未遇到的饥饿；另一方面精神上也陷入极度恐慌之中，用消耗自己的身体来应对饥饿，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此时，已经有不少人病倒了。农场开辟了几间病号室，把重病号集中起来。大家思想负担很重，一进病号室，就意味着自己大概不久就会去见阎王爷。而实际上后来死人有一部分确也是从病号室用

破席卷走的。农场有规定：平时不许串组，串队，只有在每天早上出工列队时，趁着队伍散乱的时候，走出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借机互相探问：“昨天晚上谁又被老牛车拉出去了？……”

两天后，在相互探询中，终于听到了一些消息。

小佟死了。这个孩子终究没有扛住饥饿，可怜他在人间真正享受人生只有十五年，两年多教养，就匆匆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听说小佟全家都是地道的工人阶级，他的哥哥是个产业工人，前来收尸时，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喊着唯一的一句话：

“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是的，他的确还是孩子。然而一个孩子也没有逃脱“极右”的罪名，竟至落得个活活被饿死的可怜结局。

小佟走后，有好长时间，他那削瘦的，有几片少年青春癣，颧骨高耸的脸庞，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帽沿儿已经折断，那个城边地区孩子特点的影像，久久在我的脑际浮现。如果没有运动，也许他还正在上课，下课回家说不定还会享受父母的关爱。他的父母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小儿子竟然会在未成年时被打成什么“极右分子”，最后还被饿死。唉，的确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恐怕是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分子”了吧？！

和我们一同来到农场的，还有一个中专生，叫桂景辉，大概也是16—17岁，因为后来没有在一起，不知道这个孩子落了一个什么结果。

“X组的张心涛昨晚被拉走了”

张心涛是清华大学机械系四年级学生。身体很棒，微微有点小残疾，脖子有点儿歪，听别人给他起的外号不知道为什么叫“申公豹”。在三分场旱地改水田的大会战时，他能一下子抬起四箩筐土来，足足有近四百斤，那力量真是吓人。难道他生来就是大力士吗？不是的，他是在拼命改造，好摘掉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右派”帽子。当然，他的饭量也很大，从前一顿饭能吃五个大窝头。如今逐渐减成一天二两玉米面，其余都是野菜，这巨大的反差很快就要了他的命。不知道他经过多少个日夜的寒窗之苦，考上了清华大学，想必他定有抱负，也必定有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理想，然而，还没有走向社会，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巨浪把他推掀到劳教农场，还没有参加工作，就来了个中国式的“行政处分”，却这么无声无息地饿死了。

“张庆家昨晚被拉走了。”有一天出工回来听说。

在三分场我和张庆家曾在一个小组。他是湖南人，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数学老师。三十多岁，人很厚道，大小事从不与人计较。来到于家岭我们不在一组，没想到他也被那辆“殡车”送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有一阵子，我头脑中经常浮现出张庆家那忠厚、诚实、和蔼、深沉的影子。怎么这位难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两年前，他在华侨补习学校，绝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会被一张破席卷着，扔到于家岭荒野的浅浅的土沟里，就是他今生的归宿。

对于一些年纪较大的“右派”来说，饥饿是致命的打击。质量低劣的所谓食品，根本弥补不了他们年老虚弱身体的支出，健康状况一天天恶化。因此，除了年轻体壮的“右派”之外，就数老年体弱者死得多了。

我当时已近三十岁，在我近三十年的生活中，虽然清苦，还没有挨过这样的饿。更没有想到饥饿也可以把人的神经刺激得畸形地扭曲。同我在一个组劳动过一年多的，北京一位资深望重的老演员戴

涯，那时可能已过了天命之年，他演过不少话剧，在话剧界颇有声誉。因为肃反整他整得有点过头，他不满意，整风时不免有些怨言。新老账一齐算，划成“极右”，送来教养。我们把他尊为长者。他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劳动也是尽到了力所能及。在大饥饿中他得了浮肿病，不能出工劳动，躺在宿舍休息。同一宿舍的“右派”家里来人探亲，送来一包饼干。大家出工以后，饥饿把他的神经刺激到了极限，实在撑不住了，竟然把别人那包具有诱人食欲魔力的饼干吃了个精光。等到大家收工回来，饼干的主人也饿得心里发慌，一进门，急着去找那包饼干，发现饼干竟然不翼而飞了。非常气愤地大叫大嚷：“谁偷了我的饼干？谁干的这种缺德事儿？！”这位资深老演员才从理智中醒悟过来，听了饼干主人的叫嚷，心里十分难过，老泪纵横地哭了。他这一生，直到吃人家饼干的一刹那，都没有想到有个“偷”字，如今这个耻辱性的字眼竟和自己粘上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上前安慰，他才不好意思地说：“我实在是饿得失去了理智，把你的饼干吃了。我好对不起你，我一生都没有偷过人的呀！”然后，他擦拭着眼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大家说一千，道一万也不会想到饼干是被这位尊敬的长者吃掉的。而饼干的主人也感到刚才的不理智，对不起这位一向被自己尊重的长者，走上前表示道歉。一边是潸然泪下的老者请求原谅的凄楚忏悔，一边是转气愤为友善安慰的年青人的真诚，他也泪水盈眶，双方突然拥抱在一起。大家无言地看着这，仅仅是因为一包价值不及一元的饼干引发的一幕人间罕见的悲惨剧，都感到心情沉重而难过。这令人酸楚的悲剧究竟是谁一手造成的？剧作者又是谁呢？

“盛强昨晚被送走了。”两天后又传出这个消息。

盛强在三分场和我也同在过一个组。他大概接近五十岁了。北京某戏剧学校毕业。建国前一直从事京剧的编剧和管理工作。在前门外粮食店街的“中和剧院”担任过经理。后来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仍然作的是京剧研究工作。就在该单位被划成“右派”。不爱讲话，不管闲事，情绪低沉。在三分场时总是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我想他的心事太重，一天也听不见他讲上一句话。来到于家岭没几天，怎么他就死了？

听和他同组的魏巍说，魏家里给捎来一盒猪肉罐头。出工的时候大家都走了，宿舍里就留下病号盛强。等到收工回来，魏巍的罐头不见了。在这饥饿威胁生命的当口，一听罐头的价值，简直仅次于生命。再加魏巍是个急性子，也是在宿舍大声嚷嚷谁偷了他的罐头。同舍的人为了表白自己，纷纷说明大家一起出工，互相都可见证。怀疑的对象自然集中到盛强身上。过了一会儿，盛强起来也哽咽失声，说罐头是他病倒，实在忍不住饥饿给吃掉了。这一来又使得魏巍不好意思了，忙陪着笑脸连连向他表示歉意：

“老盛，我这人你也知道，是个急性子，我以为别人拿了，乱嚷嚷一通，对不起，虽然我们处在大饥饿的非常时期，但那也不过是一听罐头，请你别介意，你有病，吃就吃了，没什么，养病要紧。”

盛强年纪大一些，古人说：“衣食足则知荣辱。”老盛一生从事京剧事业，他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加以性格内向，恐怕他一生都没有经过这种旷古未闻的饥饿折磨，在理性被饥饿扭曲的情况下，作出了这件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来。现在当理性恢复，才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丢面子的、对不起人的事而泪水浸满了眼眶，唏嘘得说不出话来。大家既感动又悲伤，一同说：“我们虽然来自不同单位，大家在一起改造两年了，既是难友，也是朋友，一听罐头谁吃了也一样。老盛病了，身体不好，吃就吃啦；魏巍年轻，不计较这事，没事啦，赶快休息，没事啦……”平时对窝头大小都斤斤计较的人，

这时又互相谦让了起来。

要命的是此事不知道怎么被队长知道了，批评了老盛几句，老盛为人极要面子，这一来，无异于往他心上扎了一刀。

大概因为老盛心事太重，又发生了如此不愉快的事，饥饿依旧，郁闷在心，大家搬到于家岭以后，分场喇叭把他的事广播了。他心中更加难过，终于没熬了几天就撒手人寰。自然也是被那张破席卷了，被那辆“殡车”拉走的。

几乎二十年后，我才知道盛强的妻子是80—90年代走红，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评剧演员、笑星赵丽蓉。2000年7月，赵丽蓉溘然病逝。而后，赵的朋友张平、郭民杰写了一本《艺苑奇葩——赵丽蓉》（2001年12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有一段关于赵丽蓉去农场探望盛强的叙述：

……看管员问：“你找谁？”丽蓉微笑着：“我来接盛强。”“盛强？他是你什么人？”看管员上下打量着丽蓉问道。丽蓉：“他是我丈夫。”看管员说：“他不在了。”“他咋会不在这儿呢？”看管员重复着：“这个人不在。”丽蓉急切地问：“啥？同志，你说啥？”看管员说：“他死了！……”丽蓉惊呆了，说：“他死了？……不，不对，你弄错了，这不是真的，他绝对不会死，他咋会死了呢？不，不，他没死……”看管员：“他是死了，他真的死了，你没接到死亡通知书吗？”丽蓉觉得眼前发黑，双耳轰鸣，她麻木了，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他的尸骨呢？”看管员说：“死去的人都埋在西边的那片荒地里，坟前有个木牌写着死人的名字。你上那里去找吧。”

丽蓉强忍悲痛，想弄个明白，她镇静地向看管员乞求着：“我求求你，请你告诉我，我丈夫真的死了吗？他到底是咋死的？”看管员被丽蓉的诚心感动了：“你丈夫在劳动的时候，背着烧完的砖，从砖窑里走上来以后，他踉跄地走了几步，突然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当时就送到医院，经过抢救医治无效，就这样死了……当时有人问医生，他是什么病死的？那位医生摇摇头说：“查不出来。”

我们到茶淀农场劳动，盛强始终就和我在一个队，同在一组，同住一屋一年多。他死的经过，如今在世的至少有十几位难友记忆犹新。我们同盛强在农场一同劳动近三年，直到他被饿死，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砖窑，我们和盛强从来没干过背砖的劳动。有个早已坍塌了不知多少年的地方已盖了房子，叫作北砖窑，那只是一个地名而已。那已经成了“老残队”的一批等死的老头病号集中地。（后来，在从维熙所著的《走向混沌》一书中记述说，翻译家吕荧1968年就是在那里死掉的。这位著名而正直的翻译家、美学家、教授，去世时，竟落得冬季里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夜里御寒的棉被已破烂得成了一团破棉絮，棉絮中爬满了虱子，极为凄惨。）看了作者关于盛强的这一段描述，几位难友谈起来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这社会已经变得编出来的谎话似乎比真实情况还真，人简直成了地球上最会说谎话的动物了。这已经是离开当年四十年后的事了。真实的经历及记忆和书上的描述竟是如此地迥然不同。真不知道那位“看管员”是谁，他编的那套鬼话，竟把赵丽蓉骗得信以为真了？还是其中另有原因？还是作者想象力超人地丰富，编出了这一段离奇的“故事”？

紧接着情况进一步恶化。恐怖气氛默默地弥漫在农场。我虽然比较年轻，在漫长的饥饿煎熬中，同样身体也是支持不住，逐渐发展成了三度浮肿，也成了病号，留在宿舍休息。我想，我所以没有被那辆用炮车改装的“殡车”拉走，是因为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参加劳动。

从开始死人，在临时来帮忙的医生（这位医生大概也是劳改过的）那里就诊后，给了我一包酵母片（没有其他药，给所有病号的只有酵母片）。我把这包酵母片像吃糖果一样，一片一片地放在嘴里含

化了。好像这不是药，不是治疗浮肿的药，而是治疗饥饿的药。腿依然肿得像面包，用手一压，肌肉上就会出现一个深坑，好久不能恢复，走起路来飘飘然像在棉花上走路，东摇西摆，无法走稳。

这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检验设备和人员。也用不着检查，只要用眼一看，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病号。

沈志庸(北大物理系学生)在的那个队的管教队长，有一种独特的鉴定病情的方法。他走进房间，先叫几个人的名字：

“×××，站过来！”

“××，站过来！”

“……”

叫四、五个人过来以后，就说：“褪下裤子，转过脸去！”

他审视完大家的屁股，然后他就会指定：“你，你，你，不要出工了，搬到病号室去！”

他这是一种什么检验方法呢？原来他让大家转过身去，是看大家的臀部，谁的臀部已经瘦得没有肌肉了，只剩下两根像枯槁的玉米杆似的股骨，支撑着一个下陷的皱皮黑洞——肛门，就会被认为是病号，不能再劳动了。他们这是对待“人”吗？我们还是一群“人”吗？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医院，哪个大夫使用这种方法来检查病情的。在农场有许多事都让我们开了眼。

有一天上厕所，看见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来的徐鸣珂灰头土脸站在那里，膝盖和胸前也弄了一些土。几个月没见，怎么成了这副样子？我走上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上厕所，站站——站站不起来了，刚刚一站就——摔倒，爬爬爬——在地上，起也起不来，这这——这刚刚爬爬——爬起来，老赵，我们怕是回回——回不去了……”我走上前替他拍了拍胸前的土，忽然，我感到他苍老了许多，面颊上好像贴了一层垃圾堆捡的、被弃了很久的土豆皮，干瘪得一点肌肉也没有，灰暗，干瘪，眼眶里噙着泪珠。我看着这位从半步桥就在一起，又一同来到茶淀三分场，到于家岭分开也不过几个月的难友，竟然成了这个样子。听了他的这一番话，由不得我泪水盈眶，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的俄语翻译，《列宁全集》的卷21是他译的。只因为建国前作过《安徽日报》的记者，这就算历史问题。尽管整风时他没说什么，也来个新老账一齐算，划成了“极右”。正在谈婚事的女朋友也被“组织”的政治大棒打得劳燕分飞，不知去向了。家里也没有亲人，孤零零来了两年多，他就落得成了一具饿殍。我给他拍拍土，搀扶他走了几步，这时候我才说出话来：“唉！老徐，听天由命吧！说什么，想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得学学佛教徒，把精神集中到一个‘空’字上，不然，我们明天就可能驾鹤西行。唉，最好让头脑停止思维。现在我们这样子，难道不像一个躯壳？……”

此时的伙食已基本定型了。每天二两玉米面，三顿饭就仗这二两玉米面和马齿苋熬成稀里咣当的三舀子粥。开饭时，每队从伙房抬出一个大木桶，盛着这种粥。顺着粥桶排起来一队面如菜色、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瑟缩枯槁，夹着饭盆的队伍。大部分人腰里系一根草绳，瑟瑟缩缩，他们的身体几乎没有什么抗寒能力了，站在院里，不住地双脚变换着踏地暖脚。这情景如同在电影上看见过的灾荒之年给灾民“舍粥”的景象一样。有些人领到那盆粥，一边走，一边用舌头舔舐着盛粥时滴拉在盆边上的那一点点粥，生怕浪费掉一丝一毫贵如生命的这种东西。

有一次，我站在大桶旁看着发粥，粥发完了，当时我是“统计员”。有俩人积极主动地要求把空

桶送回伙房，我以为他们的精神很好，请示队长同意后，就让他们去送。没想到一经允许，他俩就像疯了似的，立刻扑向空桶，把上半身探到桶里，快速地用手刮取桶壁上留下的那点残留粥。俩人挤在桶里不断用手刮了往嘴里吸，发出“稀——溜——稀——溜”的声音。等到抢、刮、吸完那点残粥，把上身从桶里抽出，衣服和帽子上粘了一些粥，他们也顾不得什么脏不脏，用手从衣帽上擦了又往嘴里舔。天啊！这……这在世界上难于捕捉到的凄惨镜头，真应该“咔嚓”一声留存下来。这情景委实让我在那里看得发呆。这叫什么事儿？他们怎么啦？饥饿竟然把这群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折磨扭曲成了这副样子？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正常的人看了这场面，都会流下眼泪来。这些人的家属如果在此看到如此的凄惨场面，说不定会有人晕倒在地。他们原来在不同单位工作，也是干部、老师、大学生，也是正常的，有礼貌的，体面的，有尊严的知识分子。可现在哪里像一群知识分子呀？这是一个人的群体，可现在这群人怎么了？人常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他们现在却斯文扫地，分明是一群贫病交加的特殊乞丐啊！是谁使得他们成了这个样子？他们是怎么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呀！？

大部分人不能出工了，干活也只是应个景，等于到地里溜一趟。在出工的路上，张志华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跟我聊：

“昨天晚上，一直饿得我睡不着觉，快两点了我才睡着。想来想去我把陆游的一首诗改了，《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你知道吗？”

“我大体上记得，是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的那首？”我说。

“对，对，我把它改成这样了，你听听：‘僵卧寒屋枉自哀，爱国也能获罪灾。夜阑饿听车轮滚，不知死神何时来？’怎么样？”

“你可真是书呆子，都饿成这样了，却还有兴致改诗，改了这首诗，是不是等于吃了一个窝头，然后就睡着了？还有一点，要是不注解，外人根本不知道。‘车轮滚’是每晚都要拉走我们同伴的那辆特殊‘殡车’，局外人不容易了解它的悲惨含意。”

“哈——哈哈——哈哈！这注解还不好注哩。”他开玩笑地一阵大笑。

这玩笑实在是苦中作乐，颇像俗话说说的“黄连树下弹月琴”。过后，他严肃地对我说：“真的，我们现在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了，随时都可能命丧黄泉。”

“人到了这个地步，就要想得开，胡思乱想没有用，正如你诗中所说的‘枉自哀’，我看头脑里应该只有一个‘空’字，什么也不要想，还是听天由命吧！”

在地里大家并不劳动，许多人在到处搜寻能够进口的东西，诸如冬眠的青蛙、蛇、昆虫，乃至老鼠；头年收割完拉在地里的白薯根，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有没有毒的草根……都带回宿舍，找些柴禾，架几块砖就是炉灶，拿自己的饭盆儿当锅，煮着吃。还有的人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于是把自己的皮腰带煮软了吃，还说是学习红军长征过草地的精神。更有两位神经不正常的，把别人家属探亲带来点心，人家吃完点心扔掉的包装纸拿来煮，要把纸上的油煮下来喝。出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酸辛怪事。

早晨出工站队，依然是首先探询昨夜什么人躺上那辆牛车走了。人们交头接耳地传着：“×××昨晚走了。”“谁呀？谁呀？”“××也完了。前两天就起不了床了。”……

差不多每天总是有人再也见不到了。大家的心头依然是沉重和恐怖。大家稀稀拉拉不成队形地排队出工，到地里干不动活，躲在避风处晒太阳、聊天，对付到十点多，就磨磨蹭蹭，溜溜达达地回来了。队长也知道这群人已经成了饿殍，根本不能劳动，基本上没人管了。走在路途上好像成了一群伤

残的败兵。

有一天，杜兴昆家里寄来包裹了。去队部取时，他很高兴，此前他接到家信，说包裹里给他装了吃的。没想到他回来一进门就破口大骂：

“我操他姥姥的！家里给捎来几个火烧，丫场部规定包裹里的东西可以给，吃的东西全部扣下。他们丫扣下你们猜干嘛啦？丫他妈搁干部小卖部卖，全让丫管教干部们买走了！这帮孙子，你们说毒不毒？这是诚心要往死饿咱们，我操他丫八辈儿祖宗！就让丫们缺德吧。你们瞅着，总有一天，丫非遭天报应不可！”……

果然，这确是场部的规定，所有人后来寄来的包裹，都把食品扣留了。有些家属从北京和外地赶来，把从自己家人口粮中挤出来的，可充饥的食品艰难地送到农场来，在茶淀下了火车，还要背负着这些沉重的食品走 20 至 30 里地才到分场。其中还有不少是年迈的父母艰辛地送食品来救助自己的儿子。这些远道而来的家属哪儿知道，当他们怀着释然的心情离开农场之后，这些救命的食品最后却被拿到大墙之外的小卖部，卖给了管教干部，实际上竟然落入了别人的肚子！

这可真是一个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又很残酷的要人命的决定。这无异于从濒临饥饿、死亡的“右派分子”口中夺食，加速我们身体的恶化，加速“右派分子”早日死亡。

下了一场冬雪，天气骤然冷到零下十几度。大雪覆盖了大地，已经无法出工劳动，场部布置让学习报纸。天特别冷，还刮着 6——7 级大风。农场不像城市，有楼宇和树可以阻挡大风，每到大风刮起，寒风能够吹透棉衣，6、7 级大风，远胜过北京 10 级的风力。我们这批饿殍真要走出去，必定会被吹得东倒西歪，站立不住。只能蜷缩在屋子里。大家坐在床上披着被子，把脚伸在褥子下边。由于饥饿和身体虚弱，抗寒能力大大降低，一个个瑟缩成一团，不住地发抖。坐在那里，哪儿还有心思学习。

夜晚睡下来，屋子里没有火，冷得如同冰窖，窗户上也全结了冰。大家一动不动地躺在被窝里，双脚冰凉，又冻又饿，真所谓“饥寒交迫”。虚弱的浮肿病躯大大降低了御寒能力。这时候才体会到人在冻、饿煎熬中是睡不着觉的。每个人都不讲话，在死亡威胁的恐怖气氛中谁也没有精力和兴致聊天，连最爱发牢骚的杜兴昆也无声无息，为的是保存自己仅有的一点体能。雪光把窗户照得发白，玻璃好像成了磨砂玻璃。空间是绝对的“万籁无声”。在这寂静的无声之夜，只有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嘎噔噔——嘎噔噔——嘎噔噔……”的声音。那就是那辆侵华日军炮车改装的牛拉“殡车”，它一会儿由近而远，过一会儿它又由远而近。大家虽然无声地躺在床上，但心里都明白，它每次远去，就意味着把我们的一个伙伴又送上天国；它每次回来，又将拉走我们的另一个难友。大家静静地躺在床上，静听着这车轮声，我想大家的心脏一定是忐忑不安而又微弱地跳动着。饥饿致死是无声无息，没有任何征兆和表象的，是一种“睡亡”。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我们这 10 个人，明天会不会有人再也不会起来了！？这情景不由得使人想起叶塞宁《冬天》里的诗句：

茫茫的雪原，苍白的月亮；
殓衣盖住了我们这块大地。
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整座树林，
这儿谁死？谁？莫不是我自己？
……

唉！这儿谁死？谁？莫不是我自己？

这是 1960 年 12 月的严冬。我们这群被所谓“行政处分”发配到茶淀的“右派分子”被置于绝境。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只有临时来的医生带来的“酵母片”。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病症，只有饥饿，饥饿，饥饿！

我们的生命将被饥饿消灭。

这残酷的历史纪录恐怕永远不为人知！

唉！我们的生死就在一瞬间，听天由命吧！

每天早上站队的第一件事，照例是互相探询昨夜哪些难友又上了那辆“殡车”？照例是一阵交头接耳，窃窃低声探询着：“×××昨夜被拉走了。”“×××也走了。”“×××已经不行了，恐怕拖不过明天。”……

恐怖气氛已在暗中折磨着每个人。在这个将近一千多“右派”的分场已经死了不少人。而且每天还继续有人被破席卷着送上那辆“殡车”。至于究竟死了多少人？因为平时按规定都不许串组，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统计，不可能有精确的数字，大体上估计，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死掉了，应该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在大跃进的喧嚣声中，中国的大饥荒灾难同时在全国已展开，后来才知道全国饿死人数竟达三千多万人。我们这些“右派”在大墙里并不知情，相比之下，于家岭劳教农场死个几百“右派分子”那实在是小菜一碟，无足挂齿。

北大法律系学生魏巍，在三分场是个棒劳动力，大战防洪堤的时候，他和民政部来的王臻抬土方是出了名的人物，他们俩一抬等于一般人四抬。看着那几百斤湿土快堆到扁担的挑子，真有点吓人。如今人却瘦得如同一个干瘪老头，脸上没有肌肉，只有一层皱皮。走起路来也是晃晃悠悠。有一天在伙房附近碰到他，他告诉我：“我本来体重 138 斤，刚才在伙房门口看见有一台秤，我秤了秤，现在只剩 75 斤了。”我只能向他道一声“珍重”，还能说些什么呢？还敢说些什么呢？

死的人多了，就专门抽调一些人去挖“死人坑”。可是挖坑的人也是病号，根本无力挖掘，费上半天劲，也就能挖 30 公分深，把死人放进去，用周边挖出来的土，薄薄掩埋住尸体就算埋葬了。所谓的“坟”，也不过是高出地面 20 公分的一个条状凸起。然后，捡一块砖头，用粉笔写上死者的名字，戳在“坟”头。这就是死者的“坟墓”和“墓碑”。这个简陋的“墓碑”，只要经过一场雨雪，那粉笔碑文就会荡然无存。那一片地面凸起来的土堆儿经过一场雨雪，也会塌陷下去，而后春风拂过，大地又会杂草丛生，形成坑坑洼洼的一片难于辨认的、饥饿而死的“右派分子”的无名荒冢，乱坟岗子。多亏农场没有狼和狗，否则这些死尸埋得那样浅，恐怕早就被狼、狗啃成了支离破碎的枯骨碎片了。尽管如此，他们却“有幸”得到了“土葬”的优待，后来家属去凭吊，虽然找不到也无法辨认亲人的“坟墓”和“墓碑”在哪里，也许唯一可以得到的一丝安慰是“土葬全尸”吧？

我不由得纳闷，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吗？这不是远远超过了《刑法》了吗？这批活人变成了白骨，谁负责？谁敢过问？世界历史上有过这种“行政处分”的记载吗？

夜深人静，我躺在冰冷的被窝里，瑟瑟颤抖，冻得无法入睡，唯一的声就是那一阵有一阵无的“嘎蹬蹬——嘎蹬蹬——嘎蹬蹬——……”特殊车轮声。那沉闷而又清晰的铁轮的声音，好像一把巨大的铁锤，有节奏地击打着我们半僵的躯体，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可能我就会乘上那部豪华殡车

走向极乐世界哩。

冻得无法入睡，免不了常常默默地想：建国之初，赶走了国民党，迎来了共产党。我们都抱着为国家建设献身的理想走上工作岗位。真的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努力地工作。总在想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反对共产党，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不过是希望通过整风，把党内的不健康的東西整掉，以使党进一步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期望。而实际上有些党员建国以后环境一变，确实存在诸多毛病，特别是“特权思想”的广泛存在，这绝对是事实。整风时不是一再动员大家提意见吗？不是一再说什么要“帮助党整风”吗？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怎么搞了半天，竟变成倒转来收拾提意见者的“阴谋”了？毛泽东远在1945年和黄炎培的谈话中不是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吗？而今，我们还没有监督政府，只是给确实有问题的个别党员提了点意见，不容分说，就被扣上了“右派”帽子，用对付政治犯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国家领导人能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

我反复在想，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以“人民”的名义，而人民的权利瞬间又会被剥夺得精光，过去被告知的理想社会像是一个美丽的梦，这美梦如今已被现实击打得粉碎，实际上这国家恐怕已经落入一个二十世纪新皇权手中，知识分子阶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无力和软弱，似乎已经不是“夹着尾巴做人”了，而是一切都必须逆来顺受。但翻过来再想，我们至少是一个爱国者吧？我们根本没有作过为害国家民族的事，为什么把我们排斥在“人民”之外？为什么要妄加罪名剥夺我们热爱祖国的权利？“国家”是所有中国人的，并非一部分人的。当我们满腔热情，期望祖国富强，并付出自己的一分力量时，为什么竟能被推出“人民”的队伍，根据什么剥夺了我们作为人民的权利？此时，我似乎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不禁使我想起了莱蒙托夫的一首小诗：

我们闭起两眼，
饮啜着人生的酒杯，
把它的金边打湿了，
用我们自己的眼泪；
等到在死神的面前，
那幅帷幔从眼睛上落下，
而诱惑过我们的一切，
也随着帷幔消逝了；
那时候我们才看清楚，
金杯原来是空空的，
它里边也曾有过美酒——幻想，
而它——却不是我们的！

一个国家竟然只允许一部分人去爱它，而把另一部分人划出去，不允许他们去爱国，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事？难道国家也可以被人垄断？我们的国家究竟是什么体制？难道社会主义还能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是不是成了“率土之滨，莫非王奴”了？

唉！俗话说：“该死活不了，该活死不了”，一切听天由命吧！

就在恐怖和饥饿笼罩着农场，近 1000 “右派分子”死掉四分之一的非常时刻，大家都在无奈地等待死亡的当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农场开始从附近河北省的一些县里调来一些当年收获的白薯。于是，我们稀里咣当的粥里多了几块白薯。别小看这几块白薯，可真解决了不小问题，仅仅这几块白薯，就把走向酆都城的“右派”队伍又拉了回来，死人开始减少了。

大家仍然没有劳动能力，每天这群散兵稀稀拉拉晃悠出去，在地里找一处避风的地方，大多是作“精神会餐”。你说曾吃过什么美味佳肴，他又说什么地方的小吃如何如何的地道；这个说：“现在有一碗炸酱面，也能算最好的食品。”那位说：“就这白薯管我一顿饱，死了也值！”……只有我和张睿一言不发，不去谈论那种没用的事。但丁说过：“在不幸之日，回忆欢乐之时，是一个不能再大的痛苦。”我想，只有设法保存我们的生命，才是唯一应该考虑的问题。

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白薯粥救了我们这批“右派分子”的命。随着春天暖和起来的气候，大家似乎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身体好像渐渐开始好转，至少估计自己不大可能死掉了。这时候突然又交了好运，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种的一批萝卜冻在地里，让我们去收。

我们这批几乎走不动的“右派分子”，头一天下到这片地里，有些人马上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些依然浮肿体弱，蹒跚而来，还在长期饥饿煎熬中的“右派分子”，忽然被这极为平常的食物——萝卜刺激了神经，那副衰弱不堪的病躯像刚注射了兴奋剂一样，突然迸发出一股力量，跌跌撞撞，两步并作一步地纷纷扑向那些红色的萝卜。他们拔出萝卜，根本不洗，在脏衣服上蹭一蹭，就等于洗过消了毒，没命的往嘴里塞。嘴里还没有嚼完，就又扑向另一个萝卜。这情景与其说是“收获”，不如说是“扫荡”。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机关、学校、团体也曾体面地工作，在社会上也是体面而理性地生活。如今饥饿竟然使得他们像疯子一样，完全失去了理性。这场面也算得上是一幕悲剧性场面。

李队长平时总爱大声训斥大家，实际上他心地不错，现在看到人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失控。当时，他也无力按部就班地布置“收获任务”，估计他知道大饥饿中，人会控制不住自己，吃得过饱而撑坏。他知道这批人长期处在饥饿中，一旦过量暴食会发生意外。他焦急地大声喊着：

“大家不要乱吃，乱吃会把人吃坏的！”

“注意！注意！不要没命地吃！”

“不是不让大家吃，乱吃是会出大问题的！”

“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吃多会撑出大病的！”

“……”

但是他喊他的，却没有多少人理睬。他只好跑到那些“疯吃”的人们面前去一一劝阻。另外一个高队长，也一再喊：

“不是不让你们吃，那么狂吃是要生病的。别的场有家属送来吃的，一下吃了三斤大饼，把胃撑破了，到医院作了手术，差点儿要了命！大家可得注意呀！……”

杜兴昆不听那一套，一边“疯吃”，一边骂骂咧咧：

“我他妈听你那个？你们怎么没吃出病来呀？我还就要吃，操他大爷的！今儿个让我逮着了，我能不吃？我他妈不吃是傻B！我还得他妈吃饱喽，就是死，也不能当他妈的饿死鬼儿！……这，这，这是谁积德种的？赶明儿我得冲北给他磕仨响头，他这救了多少人呐……”

我和张睿是组长，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知识分子，为人正派，思想纯正，小心谨慎，不敢作半点越轨的事。我和他可以说是一对“迂夫子”，虽然和大家一样饥饿，却受了“饿不苟食，死不苟生”古训的影响，农场指派我们担任组长，就该作出表率。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只有我们两个人宁肯忍着饥饿，也不肯伤害自己的自尊心，一口萝卜也没有尝过。

一连五、六天，天天出工时大家情绪挺高，因为那已经不是出工，而是去吃萝卜。这一阵比前几天好一点，多多少少一边吃，一边能干点活，用箩筐装一点慢慢抬到地头，集中起来以备马车来了拉走。但是无论干什么，嘴是绝对不能让它闲着，边走边吃，边干边吃。这萝卜究竟有多少营养没人考虑，它能填饱肚子，能解决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极大的满足。本来这一点萝卜，在正常情况下，用不了多少天就会收获完。如今处在大饥饿时期，里里拉拉差不多干了快一个月。大家真没想到萝卜居然成了救命的宝贝。借助这宝贝，我们这批“右派分子”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确实有了一点好转。

然而，人在长期饥饿以后，很自然地在精神上会产生一种反常意识，就是不懂得饥饱。肚子已经吃饱了，可心里仿佛依然没饱，还想吃。看见吃的东西，还要下意识地往嘴里塞。也许这是现代精神病学上还没有的新科目——“饥饿精神病”。

在这种反常的精神状态下，许多人在田里，边干边吃，不停地吃。一说收工，他们总还要想尽办法，腰里扎一根草绳，把萝卜塞在后背；或者扎住裤脚，把萝卜塞到裤筒里；还有装在书包、背包里带回宿舍。晚饭喝完那碗白薯野菜粥，坐在宿舍，不断地发出“格噌格噌”的声音，不停地嚼着。好像也成了一种病态。

杜兴昆就是一个典型，他不停地吃，但肚子毕竟有限，吃不下也在嘴里嚼着。他一边嚼，一边还唠叨：

“操他姥姥的，你们说，我他妈是怎么啦？怎么没他妈个饱？老他妈想吃。操他的，是不是得了他妈‘饿癆’啦？这叫什么事儿？以前光听说有‘饿癆’，可是没见过。嘿！这回让他妈我给摊上啦！这病还真他妈厉害，把人弄得跟疯了似的……”

“我好歹活了多半辈子啦，操他大爷的，我越琢磨越觉着不是滋味，我他妈拌了几句嘴，你们丫愣说是吵架。吵架就他妈算吵架吧。把我圈进来，你倒说圈多少天呀，没他妈日子！操！这他妈什么法律？小日本时候也没这样儿呀！还他妈说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要饿你，往死饿你，哪个杂种操的叫这么干的？……”

“有时候我也琢磨，都他妈四十的人啦，瞅瞅自个儿这德性！我他妈都是有儿女的人了，真他妈一点儿起子也没有，我这阵儿这德性样儿，让我家喽（妻子）看见这‘饿癆’丈夫都恶心。孩子们看见我这叫花子爸爸也觉着丢人，唉，这人活成什么啦？唉！饿死就饿死得了，这他妈叫什么事儿！……”

后来，每天连吃带偷，比装上马车的还要多。场部让队长每天收工回来，在场门口收缴。大家站好队，一个一个地搜身，把搜出来的萝卜装在麻袋里拿走。尽管天天搜身，要偷的还是每天照偷不误。杜兴昆可真叫“满不悛”，队长收他的萝卜，他和队长夺，还嘴里不干不净地嚷嚷：

“嗨，嗨，嗨，怎么着？你敢情吃饱啦，这他妈破萝卜也不让往饱吃？”队长把萝卜搜走了，不理他。队长也知道他是个没文化的农民，经常胡搅蛮缠耍无赖，也不和他计较。他还不依不饶地骂骂咧咧：

“你给我瞧瞧不让吃饱的法律，我就知道犯了错儿有判刑的，有枪毙的，没听说往死饿人的。再

说啦，我他妈有什么罪过？自古以来没听说过吵嘴也算犯法的。我他妈没罪过，我就得吃！”一边叨唠，一边动手从麻袋里拿萝卜。气得队长也没办法。

有一天在队部开会。会后李队长把我叫住，问我带什么包没有。正巧我带着一个军用草绿色挎包，我还没有弄清楚他要干什么，他一把拿过挎包，从收缴萝卜的麻袋里给我装了一挎包萝卜，说：“拿回去吃去。没事。”

他这样作，使我很为难，怎么会没事呢？但又没办法拒绝。只好勉为其难地拿了回去，把挎包挂在我的铺位上方钉的一个木桩上。

没想到就在我出去上厕所的工夫，宿舍里就炸了窝。原来我刚出门，杜兴昆就去摸我的挎包，一摸是萝卜，就大喊：

“嗨，嗨，嗨，快瞧，当组长的偷了一挎包萝卜，咱他妈拿俩，队长就搜身，他一拿就是满满当当一挎包子，你们说怎么办吧？”

张志华和他争论起来：“他绝对不会偷萝卜，我敢保证，他不会干那种事！”

“嘿，我说你们这帮知识分子啊！？还真抱团儿，都他妈到这份儿上啦，你还护着他。你说他没偷，这萝卜是哪儿来的？嗨，你倒说呀！”杜兴昆和张志华边吵，边提着那包“赃物”嘲讽张志华：“哎，哎你光说不行，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弄得张志华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其实，我从厕所回来，在门外已经听见了。我只好推门进了宿舍，看着这阵势也挺犯难，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张志华和我平时关系好，他了解我的为人，所以为我辩护。但挎包里确有“赃物”——萝卜，而我又不好说是队长给的，真是有口难辩。张志华见我一言不发，也有点尴尬。

就在此时，咚地一声，门被踹开了，李队长走了进来，一脸严肃地对杜兴昆说：“杜兴昆，我估计着你可能要捣乱，平常你油嘴滑舌，胡搅蛮缠，骂骂咧咧，我念你是农民，没文化，不跟你计较。你别把我惹火了，我有收拾你的办法，不信，你就试试。”

“哎，哎，哎，我，我怎么啦？我。我就是说他挎包里有这么多萝卜，这不是偷的是哪儿的？这怎么啦？”

“我给的，就是我给的！你要干什么？”李队长有点生气。接着说：“我问你，大家从收萝卜以来，谁没吃过？没吃过的举手。”

没有人举手，我也没好意思举手。李队长说：“不要以为我们队长都是瞎子，在灾荒饥饿当中，大家都挨饿。这几天在地里收萝卜，我们并没有制止大家吃，恐怕没有不吃的吧？是不是？”

大家都没有说话。李队长说：“你们也不实事求是啊？！我们看得清楚，全队只有两个人没吃，你们说是谁？”

“老赵。”张志华说了一句。

“还有一个——张睿。这好像是小事，但反映了人的品质。对于这样的人，我该不该给他们也吃一点萝卜？杜兴昆，你说，该不该？！”李队长冲着杜兴昆质问了起来。

“我我，我没说不该，我是说他挎包里这萝卜还挺不错的。我，我没说别的。人家是没吃，这大伙儿都知道，这，这没错儿，人家是没吃。是该给，该给。”

“你看你那贼鬼溜滑的样儿，平时我懒得跟你斗贫嘴，你虽然没文化，可你也四十多岁的人了，别整天胡说八道，起哄架秧子。好好跟别人学学。”李队长又有些无奈的样子，责备着杜兴昆。然后

对着大家说：“给你们说实话，我们也挨饿，情况比你们好一点也是事实。我们只能按照党和国家的规定办事。我们也没有多大权，也不过按上级指示干具体活。希望大家能度过这一关，早日回到社会上去。”说罢，开门走了。

他走后，我把萝卜倒在床铺上让大家吃。大家边吃边议论，一致感到李队长讲话还是合情合理的。确实，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未来的命运。张志华跟我说：“我很奇怪，我们这群‘右派分子’的生命力真是难以想象，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居然得病的人很少，就是在大饥饿中，只有饿死的，好像没有其他病死的，这可真是九死一生呀！”

“我也感到我们活得极为不易。看样子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闯过鬼门关了。”我也谈了我的想法。

“哎，哎，我可得病啦，得的是他妈的饿病！”杜兴昆插了一句。

张说：“我们这次要是死了，你说冤不冤？”

我说：“难道没死就不冤？”

“要我说，全他妈冤，冤大发啦！”杜兴昆又插了话。

张说：“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可能回去？”

我说：“回哪儿？毛泽东说过：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作错了的，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根据此话，恐怕到现在对我们也还没完。我也真想不通，干嘛对知识分子如此过不去？”

“唉，咱们当年念这书实在念错了。”

“也许。”

杜兴昆凑过来听我们的谈话。这位农民老二哥没心眼儿，冲着我不好意思地说：“老赵，我是一个粗人，刚才我对不住您。要说我在咱这一组还就是觉着你们俩正派，我信服。”

“信服你刚才对老赵来那一套？”张志华说。

“要不说我这人没他妈起子呢！操他大爷的，这都是挨饿把人饿他妈疯了。”杜冲着我笑笑，调侃了起来：“我不是说了吗，我他妈得‘饿病’啦，您别当回事。您甭计较我就行啦。”接着一阵哈哈大笑。这位农民老二哥真的是挺有趣的。

静下来以后，杜兴昆也感慨了起来：“你们刚才说出去的事儿，我也不是不想，你们出去没准儿还能当干部，我还回去种我那二亩地去，还他妈开我那洗衣店去。丫要连这也不叫我干，那我可就得走邪路啦，操他大爷，没活路不来邪的怎么着？”

“你倒想得好，谁也干不了别的，都得继续在这农场劳动教养。”张志华说。

杜兴昆急了：“那我还不得疯了啊！操他大爷的！”

也许是天不灭我们，就在白薯量增加以后，我们这批“右派分子”的身体略为有所好转，起码是逃过了死亡这一关了。我们这批人到了死亡绝境，居然能够挺过来，保住了自己的生命，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这真是绝处逢生啊！

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乞丐，以往我在城市里见过不少乞丐，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根本没有条件谈卫生，根本不洗手脸，讨来的食物不清洁，他们的手更不清洁。但是他们却不生病。我们现在实际上和乞丐相差无几，就某种条件来说，我们还不如乞丐。在这种饥饿状态下，居然没有一个人得其他的病，只有一种由饥饿而引发的浮肿病（还有一位农民难友得的是“饿病”病）。也许“大稔”为

“洁”。这真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问题。如果再要有其他的病传染，恐怕这个教养农场就会作为“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活注脚了。未必能留下人，活人。

这就是行政处分，饿死了一大批人的“行政处分”！？

2003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47期刊登了姚小平先生的文章《寻找消失的背影》。这是一份1963年7月编制的，茶淀农场饿死人罪恶的记录，居然失落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被这位姚小平先生发现而购得。从文中所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看来确实来自公安局的劳教管理部门。不过，作为当时的亲历者，我认为：

1，统计表虽然列出了94位死难者，我认识的在于家岭死去的佟信顺、盛强等就没有列入名单，当时农场规定：不许串组，不许串队，这样一来就不可能认识和知道许多人名，相信这个死亡名单并不完全；

2，死亡时间集中在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上半年。符合实际情况。说明这些人全部是被饿死的。但所谓“死亡诊断”列明的死因是：“心脏病”、“风湿病”、“心力衰竭”、“肺病”……那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药物，也没有化验检测机构，也不需要这些，因为“饿死”，医院、医生、药物都是无法救治的，“死亡诊断”是编造的一个“政治欺骗”。

随后姚先生在文章中谈到，1960年8月16日，在茶淀农场584分场饿死的张勛仁先生的家属，1979年被通知到北京公安局接待室。在那里，她被告知：“张先生已经被‘改正’了。发给200元人民币，作为补偿。”

张夫人荆美英接过那200元人民币，走出接待室，眼含泪水，悲痛地说：“噢，一条人命难道就值200块钱呀！”这真是浸满了血的话啊！

盛强是否也发了200元？

李志军是否也发了200元？

佟信顺是否也发了200元？

那些死去的人的性命是不是都值200元？

这是谁给饿死一个“右派分子”定的价？

从法理来讲，国家并没有赋予任何人，可以假“行政处分”之名，轻取这些“右派”的性命，而情况是国家的权力被极少数人剥夺了。他们可以指使人作任何事情。包括在“行政处分”的名义下，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负罪感，没有良心的谴责，轻松地用饥饿耗干了“右派”们的血肉之躯，结束他们的生命。

二十年后，随着政治的需要，又可以“人道”、“宽容”、“富有良知”的面貌出现，给予被他们折磨饿死的“右派分子”每人200元人民币的人道补助。但这200元并非出自别处，而是出自死者生前用自己的血汗积累的“劳动基金”（他们叫做“家属赡养费”和“安家立业”基金），用死者生前的血汗再来偿还死者的性命。

从宣传的角度，当权者所有的都是世界第一，最好。处理“右派”的政策被宣传为体现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人道、政治宽容，采取了非司法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行政处分。然而实际上这不属于法律范畴的“行政处分”却能用饥饿夺去人的性命。最为歹毒、暴虐、阴险、残酷的是，当他们用“行政处分”饿死一批人之后，竟然编出谎言说死者是“心脏病”、“心力衰竭”、“肺病”、“风湿病”……

一方面把他们的罪恶责任反过来嫁祸予死者，另一方面则掩盖真实，欺骗家属、世人，乃至历史。

人们一旦明白了这背后的文章，就不难悟出毛泽东和他的专政机关的狠毒并不比布痕瓦尔德、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群岛温情多少！

这普普通通的“行政处分”竟然可以超越刑法，被用来杀人，多么可怕！

什么叫暴虐？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暴虐的吗？

一位“死亡”右派在墓地复活的经历

王铁生

这里讲述的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王铁生，即笔者本人，于1961年在北京清河农场三分场被饥饿送进“鬼门关”，又被拉回人间的真实故事。

低洼不平的土地上，两个人在拉着一辆平板小胶轮车行进。其中一人两手把着车辕，肩套一条栓在平板前端铁环上的粗麻索，一步一步蹬着，吃力地前进。另一人挽一条系在胶轮车上的长麻绳在前面拉。

“这口子也够惨的，才三十出头就埋在这荒地上，听说还是啥子名牌大学的讲师哩，他媳妇和两个6岁和7岁的娃儿今后日子咋个过啊？”驾辕的那人边喘气边嘟囔着。他显然是在说平板车上那口底层由活动拉板构成的薄皮棺材中的苦命人。

“唉，也是，谁叫他大鸣大放说三道四多话呢？”前面拉车的那人带着半是同情，半是埋怨的口吻说着。

大约经过半小时，他们终于到了三分场坟地。大片泛白的碱地上，数以百计的乱坟堆无规则地遍布各处。他们把平板车停在新挖出的坟前，驾辕的那人弯下腰，把薄皮棺材的活动底板使劲往外一抽，只听得“通”的一声，尸体掉进墓穴。就在这一刹那，尸体竟发出“哎哟”的呻吟声。还好是在大白天，况且两名埋尸人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他们没有被吓得撒腿就跑，更何况他们也是劳教犯，对被埋葬死者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他们不仅没有逃跑，还把那命不该绝的苦命人迅速送到三分场医务室。

这苦命人的确命大，终于活下来了，直到今天仍然健在。读者至此也许已能意识到，这名入土半截的苦命人就是笔者本人。

几十年来，笔者的一些亲朋好友总是要笔者讲述这段传奇式的经历。和溺水、车祸、触电的暴死不同，我经历过的是一次新陈代谢功能逐渐衰竭的饿死过程。

那是一九六一年初发生的事情，当时天灾加人祸，人们就连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得不到保证。整个社会尚且如此，劳教农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每顿饭只能以清水煮马齿苋充饥（我当时在病号队，生产队比病号队的情况稍好一些，每天多少可以吃到一点粮食）。极度营养不良使我骨瘦如柴，形同骷髅，体重由一百二十五斤减少到不足六十斤。我的体能已衰竭殆尽，膝盖以下部位常年冰凉并带有麻木感，我不得不拄着木棍老态龙钟地拖着脚步走路，稍不留意，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就会把我绊倒，没有难友们的帮助，休想自己爬起来。

终于有一天，小吴和小何——就是前面曾提到的两名埋尸人，他们是生产队派到病号队来工作的，

除埋死人外，还给病号送开水、送马齿苋——在给我灌好一暖瓶后，对我开腔了。“老王啊，”小吴注视着我的脸，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我看该轮到你哥子上路了哩。”“冬至不出年外，总是个把月的事。”小何补充了一句。由于经常同死人打交道，小吴和小何积累了一种独特经验。在闲聊中，他们曾对我们讲起过，像我们这些因饥饿而极度衰竭的人，如果出现外眼角下垂，嘴角上翘，一般不出一个月就会死去。

又过了二十多天，不祥的预言终于应验了。那天早上，当小吴和小何掀开用破麻袋缝成的门帘，进入我们病号队室内发出惯常的分发开水的吆喝声时，我发现我的四肢已不听我使唤，无法动弹，除了耳朵还能听到声音外，嘴巴说不出话，眼皮也像注满了铅似的，尽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却睁不开。我左边和右边邻铺的难友发现我毫无反应，慌忙叫小吴赶紧去找潘大夫。潘大夫很快赶来了（他也是一个劳教人员）。他马上拿出听诊器在我胸部移动，仔细地听诊。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后，他继续用听诊器不停地监听我的心脏。我还有听觉和一定的感觉，我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听到小吴和小何在商量什么时候来拉人，我也听到潘大夫在斥责他们不要瞎说，我还能有救。我突然害怕：不要在我尚未死透时就被拉去埋掉！我拚命想睁一睁眼睛或动一动嘴唇，以表示我还活着，但就是作不到。

我神志还很清楚，我意识到我已步入生命的终结阶段。我并不畏惧死亡，说实话，与其在当时那样的悲惨境遇下苦受煎熬，死亡其实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我曾经几次企图自杀。然而真正到了跨上死亡的门槛时，对人生的最后牵挂——拖着两个幼儿的妻子，年老体衰的高堂老母，他们今后将如何挺过这漫长而又险恶的人生！？——却一下子全都涌上了心头。

饿死的人与病死（比方说癌症死亡者）的人不同，饿死的人临终前不会感到有什么疼痛，毋宁说平时那种不堪忍受的强烈饥饿感，这时反而减轻了。我好像飘浮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慢慢地，我觉得我似乎从水面上飘浮到了空中，越飘越高，越飘越远。潘大夫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轻，越来越远……终于进入了绝对寂静。突然，“嘭”的一声震动，把我从虚无缥缈的寂静中惊醒。……接着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事后，潘大夫说，也许从棺材坠落墓穴的一击，歪打正着，正好起了使心脏再搏动的刺激作用。

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在劳教农场——北京清河农场三分场，亲历的一次被饿死而又“复活”的经历。它使我永记不忘。

土改运动中受难的地主女眷

陶渭熊

社会鼎革，一些人被杀、被囚，这是灾难。而他们的家属所受到的，则是更为深重的灾难。下面讲述的几个故事，是土改运动中我的亲闻亲见，就发生在我的同村或临村。

被斗挨整的“顶梁柱”

男人被杀、被囚之后，女人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在生活生产上，而且在被斗挨整上。

1948年夏天，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沈应伦和两个天使般的儿子带回家乡留守祖业，因为他的父母均已过世，家业无人照管。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女性，就在这穷乡僻壤过起了古老农村家庭主妇的生活。

沈应伦天生丽质，身材修长，肌肤洁白，虽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体态轻盈，窈窕端庄，给人的印象是漂亮、大方、高雅、有知识。乡绅仕女都以能够与她相识为荣。而她对人又热情随和，不分高低贵贱都以礼相待，这对于有几分自卑的乡下人，从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她对穷人对佃户也非常友善，轻言细语，从不摆城市女人的架子，还把她自己的常备药物给乡亲包扎伤口、治疗小病而不收分文，因此大受乡亲赞誉。很显然，这样一位知书识礼而又善良真诚的女性，绝对不会与人交恶结下仇恨。但是，她恰恰倒毙在曾经与她和睦相处的土改“主力军”（即毛泽东夸赞的“痞子”）的棍棒之下！

1949年，虽然石克坚随四川省长王缙绪、保安司令邓锡侯“起义”后被“解放”，但是迎接这位水上警察局长的，是一付冷冰冰的手铐，从此他就被逮捕关押，而与妻子音信隔绝。沈应伦当然知道形势的险恶，更知道农村是一个罪恶的天地。于是她抛弃了农村的家，委托给亲戚照管，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以此求生，苟活于乱世。

不料1951年4月的一天，两个背毛瑟枪的联防队员出现在她面前，要抓她回农村接受农民斗争，交出金银财宝。

这真是晴天霹雳！但学校领导不敢阻拦。她被联防队押走，步行80里回到老家。

她的家已是一座空房，满屋蛛网灰尘，所有财物都被农会洗劫一空。她只好寄宿在侄儿家里。第二天上午就被农会揪到了斗争会场。按照斗争会的惯例，先是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坚决斗倒地主沈应伦！”“沈应伦必须把隐藏的金银财宝交出来！”以这样的气势汹汹给被斗者以下马威。但沈应伦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向农民解释：“第一、我不是地主。按政策规定要在地主家生活三年以上才划为地主，我1948年才回到乡下，到49年‘解放’才一年多，怎么是地主呢？第二、去年减租退押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所有财产交给了农会，现在还剩下一间空房屋，如果农会需要我马上交出来。”

农民哪里听她的辩解！被邪恶的阶级斗争学说挑动起来的仇恨，已经使他们抛弃了起码的良心；况且，眼前这个虽然一身旧衣服却干净整洁、仪态优雅的女人，正是农民嫉妒仇恨的“地主太太”。在这个“地主太太”面前，“主力军”们自惭形秽感到自卑，觉得地主威风还没被打垮。为了拯救自己的自卑，他们就选择暴力，就用粗野下流话辱骂她，恐吓她。沈应伦说：“党的政策是说理斗争，你们用下流话骂人是说理斗争吗？”“主力军”们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老子不但要骂你，还要打你！”说着一群人上前去推搡她，搯她的耳光，摸她的脸，用更下流的话侮辱她……沈应伦大声地反抗：“流氓，无耻！我要向党和政府控告你们！”

到这个时候，这个天真的女人还想得到“党”的拯救，她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党正是“主力军”们行凶作恶的靠山。

这个弱女子的无力反抗激起来的是“主力军”更大的兽性，他们觉得开了这么多斗争会，还没有一个被斗争的地主敢于斥责他们。“坚决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她身上……“你去告吧！老子怕你告？老子叫你龟儿告不成！”当场把她打翻在地。沈应伦反抗着，挣扎着，呻吟着……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暴打停止后她已经奄奄一息，当晚就离开了人世。

一个真诚善良的年青女子，就这种样惨死在野兽们的棍棒之下！

在离沈应伦家百米之处，还有一户地主周寒宗，曾当过小学校长，于是就有了地主加反革命的双重身份，从清匪反霸起就被逮捕关押，后来判重刑劳改。于是挨斗争的恶运就落到他老母和妻子身上。老母是个 60 多岁的小脚女人，站在 15 公分宽的高板凳上被斗争，摇摇晃晃战战兢兢，摔下来跌伤了腿脚，就被按着头跪在石板上斗争。她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又交不出金银财宝，就上吊自杀了。接着就斗周寒宗的妻子，捆着斗，跪在瓦碴上斗，扯头发斗，扇耳光斗……她也不能忍受了，又上吊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婆媳俩双双被斗、被逼而上吊自杀！是农民的疯狂，还是政府的残暴？

在另一个村子里，地主曹志廉和他的二儿曹谋坤、三儿曹光祖于同一天被杀了。此后，挨斗争的命运就落到了曹二嫂、曹三嫂和还没有出嫁的曹三姑身上。她们被抓到乡公所关押，在温度接近 40 度的大热天，石板晒得滚烫，赤脚踩上去都受不了的时候，农会强迫她们只穿内衣内裤坐在石板上烙屁股！头上顶着烈日，臀下有如火烧，汗如雨下，又不给水喝，她们几乎中暑昏死。后来屁股上长满毒疮，溃烂化脓经久不愈。曹三姑聪明能干会写会算，不知是父母无视她的幸福还是舍不得她离开，叫她帮助管理家务，30 岁了还没有出嫁。在她的父兄被杀之后工作队和农会就说她是当家人。其实她当什么家？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她能当家作主？她只不过保管过一些财物而已。但是工作队和农会要认定她是当家人你有什么法？因此她遭受了更为惨无人道的斗争，捆绑、吊打、跪瓦碴、扯头发、晒太阳、烙屁股、淋雨雪……在受尽一切折磨之后，1952 年夏天土改结束后还被判刑 7 年，但却在劳改农场劳改到 1967 年，关押 15 年之后才被释放回家。她哪里有家？父亲被杀母亲饿死自己又没结婚她哪有家！不得已寄居在曹二嫂家里。这个当初精明强干的女人，已是一个头发斑白弓腰驼背的老妪，腿脚不便，行动困难，双手都成了鸡爪形，目光呆滞反应迟钝，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不知她在监狱里受了多少折磨！放回家还不到一年，她就含恨去世了。

像这样成为“顶梁柱”而被斗挨整的妇女，我还可举出很多。

性蹂躏

1951 年元月下旬的一天，曾经教过私塾的杨三老师家里来了三个不速之客，他们的浑名分别叫跛子、癞子和憨包（不必说出他们的真姓名，到村里一问就知道），他们鬼鬼祟祟嗷嗷嗷交给杨三老师一张字条。杨三老师接过字条一看，不尽大惊失色！拍着桌子大骂：“你三个狗日的东西犯了滔天大罪！你们杀了人了！”

那纸条上是一个娟秀的女人的笔迹：

“跛子、癞子和憨包三人估（强）奸了我，我没有脸活下去了，我只有上吊自杀离开人世！谁给我报仇呀？我要变成恶鬼抓他们。”

在杨三老师一再追问下，三人极不情愿结结巴巴地才道出了原委。原来，两个月前，被害人李芹（化名）的公爹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被没收了一切财物，眼看自己辛苦一生积攒的家产被洗劫一空，还要遭受斗争，一气之下他就吞金自杀了。她的婆母几乎昏死过去，被已经出嫁的女儿接走，家里就剩下李芹带着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儿子相依为命；而她的丈夫原是国军的一个团长，在被“解放”之后就被逮捕关押，已经一年多了生死不明音讯杳无。于是跛子就打起了坏主意想把李芹霸占为妻。跛子原是李芹丈夫的远房堂弟，因患小儿麻痹症两腿落下残疾，30 多岁了还没讨到老婆。他对李芹说：“嫂嫂，哥哥肯定被打（枪毙）了。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好困难哟。哥哥不在了嫂嫂转房给兄弟这是规矩，你就嫁给我吧。”

李芹原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人很漂亮而且知书识理，怎么会嫁一个高不像冬瓜矮不像葫芦的跛子？她愤怒不已骂道：“你给我滚出去！你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跛子毫不知耻继续纠缠，还动手动脚。李芹忍无可忍，一阵耳光把他打了出去。跛子本想用暴力制服李琼，但自量不是李琼的对手，就恼羞成怒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我找人开你的‘排子炮’。”他说的“排子炮”即是轮奸。

于是他就约了 20 岁的侄儿癞子和曾经是李芹家的长工憨包，三人把两个小孩关在门外用暴力轮奸了李芹……

第二天早晨他们听见两个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喊，李芹已经上吊死亡，桌子上留下那张纸条。他们隐隐约约感到那纸条与他们有关，但都不识字，于是就拿着条子来找杨三老师。

经过杨三老师的一阵怒斥，三个罪犯有些害怕，忐忑不安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屁事没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再后来斗争地主不断升级，打死地主也是常事，搞个地主女人算得了什么？三人也就心安理得了。

天琼（化名）的丈夫是个高中学生，本来不是斗争对象，但他的父兄被杀之后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人，生性懦弱胆小的他以为下一个就要杀到他头上了，因此抑郁恐惧，长年累月不说一句话——其实他已患了抑郁型精神分裂症。这就给家住附近的村长肖某以天赐良机，竟当着他的面奸污了他的妻子！天琼无力反抗又不敢反抗，村长得寸进尺夜夜行奸。后来另外几个男人也参与其事……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地主遭受着身体的蹂躏，精神的摧残和道德的谴责。每次奸夫离去之后她都要痛哭流涕地将丈夫痛斥一顿：“别的男人保护老婆，你能吗？你还算男人！”但丈夫只能以毫夫表情的沉默来回答她。有谁能够知道她的苦难？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来丈夫病死，她才得以远嫁他方脱离这个罪恶的村庄。

小君（化名）是个十七岁的漂亮女孩，地主的女儿。土改时她的父母都被捉去村里斗争，歹徒乘机破门而入将她暴力强奸，并致怀孕。在撕心裂肺的痛苦和辱没先人的屈辱面前，一家人束手无策，报案吗？向谁报案？政府吗？土改工作队吗？农会吗？他们除了残酷无情地打击地主，会为地主申冤？他们不但不受理反而要败坏你的名誉。一家人只能忍受侮辱不敢声张；土改时又不准地主操办婚事将女儿出嫁。无奈之下只有将女儿关在黑屋里不让出门，将破布捆在已经绝经的母亲肚皮上假装怀孕，后来这个 50 多岁的母亲终于“老来得子”……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怎么瞒得过众人。一些人给那孩子取了个侮辱的名字：“外孙么儿”。

谁之罪？小君吗？她的母亲？还是罪恶的社会？

土改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是暴力土改的罪恶还远远没有得到揭露。

我们筑路队的“范哈儿”

凡 江

我们这个筑路队的民工都是从山城重庆来的。重庆人喜欢把脑瓜不灵光的人叫“哈儿”（即傻子，“哈”字读上声）。我们这个“范哈儿”只是姓范而已，并不傻，工友们这样称呼他，只是借用了当年川军杨森手下那个师长的绰号。采用这种戏谑的叫法，觉得更亲近一些。

“范哈儿”大约读过初中，五官端正的一个小伙子。然而，天公不作美，由于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他的右手和右腿呈萎缩状态，并且比左边的兄弟短了一截，走路做事都不方便。他经常自嘲的一句话是：“我爸和妈手艺糙，没法。”

筑路队的工作是纯体力活，打炮眼、抬石头、担泥土，一般人干起来都觉得吃力，更不用说残疾人。可是，“范哈儿”做这些工作的能力，并不比别人差。他说：“指导员说的，听话，好好干就有前途，到时给你发个红本本。”所谓“红本本”，就是正式工人的工作证，有了“红本本”，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成了真正的“工人阶级”。这是来筑路队的民工梦寐以求的东西。

虽然“范哈儿”身体不“完善”，与筑路队的其他民工相比，他却有独特的优势——“出身好”。他的父母都是血统工人，响当当的无产阶级。在大会小会上，温指导员经常表扬“范哈儿”：“人家工人家庭出身的就是不同，你们谁有他能吃苦？”

筑路队实行的军事化管理，领头的黄队长和温指导员都是当过兵的。冬天，民工们天不亮就起床，洗漱、吃饭，随后扛着工具集合，排队出工。山路坑坑洼洼，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人都感到不适应，“范哈儿”的境况可想而知，由于手脚长短不一，高一脚，低一脚，有时一下踩空，滚到岩坎下，摔得鼻青脸肿。工友们担心他摔坏了腿，他说：“放心，我还是不那么娇嫩，你们看我摔坏了吗？”

打炮眼是筑路队的技术活，一人掌握钢钎，一人挥舞用几块竹片做把子的“软把子”8磅铁锤猛砸。如果使用“软把子”铁锤的人失手，掌握钢钎的人的手指就有被砸伤的可能。身体残缺的“范哈儿”两样活路都会做，他用左手握住锤把，残疾的右手辅助支撑，将铁锤准确地砸在钢钎顶端，数千下不失手。要熟练到这个程度，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筑路队开工的初期，没有礼拜天，一天在野外工作十多个小时。民工们都累得精疲力竭，蓬头垢面，后来上面恩准一月休息一天，可以自由活动，到附近的小场镇给家里寄信，买点洗漱用品。但不准“一男一女逛山沟”。

这天休息，“范哈儿”邀约我和几个男工友去爬山。

住地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山头，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人迹罕至，地面铺满落叶和枯枝。我们四、五个人排成横队，想寻找一种名叫“伞把菇”的菌子。我们争先恐后往前寻找，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最先找到。“范哈儿”走得慢一些，落到了后面。突然，“范哈儿”大叫起来：“我找到了，大家快来看！”我们跑过去，他正扒开黄叶，现出一大片上灰下白的“伞把菇”。我们刚才是从这儿经过的，怎么就没有看见呢。一个绰号叫“汤元”的工友说：“你真是哈儿有‘傻福’”。“范哈儿”脸上露出得意的样子：“谁叫你们走那样快呢。”“汤元”接着说：“找菌子算你行，你找个女朋友我就全服你了！”“范哈儿”不再说话，埋头挖泥土里的“伞把菇”。

记得刚到筑路队时，驻地的农民对我们讲，对面的山沟里有一座尼姑庵，住着一个老尼姑和一个小尼姑。土改时，因为尼姑庵有十多亩土地，两个尼姑被划为地主成份，土地没收了不说，还要大会小会挨斗争。农会说老尼姑隐藏了金银，用“老虎凳”、“仙人吊”等酷刑拷打，老尼姑交待不出来，最终被弄死了。小尼姑被放回尼姑庵，继续写交待材料。规定的两天时间过去了，不见小尼姑下山来坦白。农会的人上山去催促，撞开庵门，发现小尼姑已吊死在庵堂的梁上。听到这里，“范哈儿”叹口气说：“太可惜了，要是没死多好。”农民说，走夜路的老乡，如果运气不好，会在尼姑庵附近的山路上，遇到美丽的小尼姑的鬼魂，被吓得面无人色地跑回家。

听了尼姑庵的传说，“范哈儿”接连几天心神不定，休息时独自坐在工棚旁边的山坡上，向着对面的山峦发呆。有人向指导员打小报告，说晚上熄灯之后，“范哈儿”不按时归寝，独自在一片漆黑的山林里转悠。指导员专门找“范哈儿”谈了话。

在筑路队，“出身”好一点的人都调去搞一些技术性强、掌握机器设备的工作。“范哈儿”未能“升迁”，主要是身体问题。但他很能宽解自己，说：“和大家在一起，还热闹些。”

“范哈儿”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文革进入高潮阶段，几十里外的总部机关食堂缺少人手，“范哈儿”被借调去当了炊事员。当时我也借调在总部的一个办公室搞宣传工作。一天去食堂弄面粉搅浆糊，准备贴标语。我看见灶台上有一个熟悉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我叫出他的大名，果然是“范哈儿”。他说：“你调走几个月后，上面来要人，指导员选中了我和‘汤元’，说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查，组织信任我们，才让我们做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时，筑路队的民工对那些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去做更“高级的”工作的人非常羡慕。“他乡遇故知”，我们都非常高兴，休息的时候，经常碰面。“范哈儿”的主要工作是备菜、淘米、洗炊具之类，有时也在窗口卖饭。我去买饭的时候，“范哈儿”手中的汤瓢自然向我“倾斜”，不管是肉菜还是素菜，总要多舀一些。

总部的批斗运动非常热闹，各个办公室的战斗队都推出了“大批判专栏”。一天，我去“范哈儿”的住处，看见他正在画漫画。我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方面的才能。”“范哈儿”说：“是李班长叫我画的。说我们炊事班不能落后，我想，就对付着画几张吧。”我对美术知道不多，自认为“范哈儿”的画是很有特色的。他的笔触有些像丰子恺，环境和人物形象像用竹片编织出来的，有一种粗犷的美。他画的“坏蛋”——“走资派”、“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或胖得像坛子，或瘦得像豇豆，栩栩如生，令人捧腹。我说：“你完全可以进美术学院深造一下，专门吃这碗饭。”他叹口气说：“像我这种‘烂人’，书又读得少，谁看得起哟。”

总部的“干打垒”房子一层一层地排列在一片山坡上，机关食堂在半山的地方。开饭的时候，山下的人往上爬，山上的人往下走。食堂门前的一块空地上，放着几张长条凳，上面站着七八个批斗对象。他们都是各个办公室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个个都呈“低头认罪”的姿势。吃饭的人端着碗，边扒饭边呼喊“打倒”或“砸烂狗头”之类的口号。

“革命群众”的饭吃完了，“批斗会”也结束了。“牛鬼蛇神”这才去买饭。这时卖饭的窗口大多数都关闭了，卖饭的炊事员只顾自己吃饭，不理睬在窗口探头探脑的“牛鬼蛇神”，有的还说：“让这些家伙多饿一会儿。”这时，“范哈儿”实在看不下去了，放下自己的饭碗说：“斗争归斗争，饭还是要吃的。”他走到窗口，挨个给“牛鬼蛇神”舀饭。卖饭的炊事员嘴一撇说：“就你是好人！”

我知道这些事后，劝“范哈儿”说：“这种场合，你还是少出头好些。”“范哈儿”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但实在看不下去了。小时候，妈妈常对我说，要多做善事。”我想起“范哈儿”对我说过，他妈妈曾经去庙里替他求签，摇出了一支下签。签文是：奔波阻隔重重险，带水拖泥去度山；更望他乡求用事，千乡万里未回还。和尚说，“范哈儿”将一生坎坷，但做善事可消灾。

与“范哈儿”一同调来的“汤元”，属于轻度“出身不好”的，对于这类“敏感事情”，从不吭气，只顾埋头干活，休息时，除了背诵“老三篇”，就是向食堂指导员汇报学习心得。食堂指导员在“讲用会”上经常表扬“汤元”。不久，“汤元”被提拔为炊事班的副班长。

“范哈儿”做事勤快，别人拿他的身体缺陷开玩笑，他也不恼，机关的人，上上下下都喜欢他。有人了解他的脾气后，就跟他开玩笑说：“小范，你找个左瘸子老婆，并肩前进，走路就平衡了。”他就说：“好哇，你帮忙找一个，我请你吃喜酒！”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大串连和大批判运动过去，来总部机关的人少起来。一天中午去买饭，“范哈儿”对我说，他要回筑路队去了。我说：“后会有期，我也很快就要回来。”

“范哈儿”回去之后，来信说，筑路队转移了几个工地，有些民工感到生活艰苦，拿“红本本”看来又没有希望，就自动辞职回重庆去了。剩下的七、八十个人住在一个叫“上油房”的地方。做一些路面维修工作。

“上油房”是一个农民大院。筑路队租用了一些民房，又在空地上搭一些工棚，作为民工的宿舍。我从总部回去时，筑路队的工作相对清闲。每天的政治学习之后，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中秋节到了，上面指示过革命化的中秋，月饼是没有的。伙食团做了一个肉菜，算是过节。

晚饭后，重庆老乡都搬板凳到农民的晒场上闲聊和赏月。山乡的秋夜，清凉如水，一轮圆月从树梢上升起来，晒场一地银光。聊了一阵山区和家乡的中秋习俗，有人提议以月亮为题吟诗。在座的筑路工，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大家都说让筑路队的才子“老右”先吟。“老右”姓韦，是师范学院中文系出来的，是筑路队惟一戴眼镜的人，写诗是他的拿手好戏。“老右”也不推辞，略一思索，诗便有了：“明月照田间，社员车水忙。银水哗哗流，禾苗快快长。车得群山唱赞歌，车碎星星车太阳。”工友们说，还是书读得多的会写。

轮到“范哈儿”吟诗了，他说：“老右是满壶响叮当，我的文化连壶底都盖不住，就不在兄弟们面前献丑了。”业余宣传员“干虾”说：“你平时跟随‘老右’跑上跑下，多少也粘了点仙气，不弄几句，休想脱身！”“范哈儿”推脱不了，就说：“好吧，我试一试，大家可不要取笑。”

“范哈儿”背着手，在晒场的月光下一歪一拐地踱来踱去，几个来回之后，摇头晃脑地念出了他的大作：“月亮月亮，越来越亮。婆娘想男人，男人想婆娘。”工友们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干虾”说：“难怪你小子，打炮眼经常走神，砸在别人手上，原来是整天想找老婆。当心挨批判！”“范哈儿”见“干虾”装正神，也就认真了，他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想老婆也有罪？”“干虾”说：“就你那格式，谅你也找不到！”众人急忙相劝，都说“干虾”的话过分了点。一场“赏月晚会”不欢而散。

筑路队的女工都喜欢“范哈儿”，但真正爱他的几乎没有。“范哈儿”勤快，又热心帮忙，谁都可以使唤他。例如帮忙加工个小木凳，从县城带买点针线、火柴之类。有一个叫“驼子”的女工近来与“范哈儿”来往密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驼子”的背并不驼。这个外号的来历是，她的舌头大了点，将当时的流行称呼“同志”叫成了“驼子”，工友们就给了她这个名不符实的外号。

有一个休息日，“范哈儿”坐在工棚的床上画画。“驼子”在门口探头一笑，“范哈儿”跳下床跑了出去，急忙问：“什么事？”“驼子”将“范哈儿”拉到一边，小声命令说：“我想吃包子，你到城里去买几个！”当时已是下午，从“上油房”去县城有三十多里路，来回就是六、七十里。“范哈儿”知道“驼子”在考验自己，把手一挥说：“没问题，我马上就去！”他挎上黄帆布包就一颠一颠地顺山路跑去。

天已黑了，“范哈儿”还未回来。阴历的月初，山区没有月光。那时电筒和电池都是稀缺物资，想象“范哈儿”只能在山路上摸索前行。直到二更时分，“范哈儿”终于出现在工棚门口。他脸上汗水直淌，手上、膝盖上沾满灰尘，表情却是喜悦的，一边喘气，一边从包里掏出包子递给“驼子”，似乎在表明他与“驼子”的关系。

前面提到过，这些城里的男女民工刚来筑路队时，上面规定不准“一男一女逛山沟”，实际上就是不准谈恋爱。文革开始以来，这方面管制松了。包括“范哈儿”和“驼子”在内的一对一对的“相好”，表现了几“同”：“同吃”——在伙食团买了饭一起吃；“同劳动”——一人挥铁锤，一人把钢钎；

“同休息”——一起去县城赶集或去山头采野果。但“同住”——结婚的可以说没有。“范哈儿”和“驼子”的“爱情”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着，人们对“范哈儿”的努力和成就增加了善意和同情，拿他取笑寻开心的少了。

筑路队的“革委会”成立之后，文革进入了新阶段。按照上面的部署，筑路队在“上油房”的晒场上召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被工友们私下称为“奸臣”的新任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黄队长当场宣布，将“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韦某揪出来。只见两个五大三粗的基干民兵将“老右”的脖子卡住，双手反剪，从会场的后排一阵风似地揪到了讲话台下。长相像副统帅的黄队长列举了“老右”的多条罪状：利用文革“反攻倒算”，为自己被打成“右派”鸣冤叫屈；在中秋的晚上吟“黑诗”恶毒攻击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狂叫要“车碎星星车太阳”。

黄队长特别指出，有些出身好的人也与“老右”一唱一和，散布“封、资、修”的东西，如不悬崖勒马，离反革命的泥潭不远了。

我知道是说的“范哈儿”。偷眼一瞥，只见“范哈儿”在队伍里低着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黄队长布置了一批骨干对“老右”进行重点批斗。筑路队的民工大都是那个时代的“城市边缘人”，筑路队的温指导员在训话时，对这些人的统一称呼叫“社会渣滓”。这些人大多数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本人有“劣迹”，例如“摘帽右派”、“历史反革命”；因为“出身不好”而不能升学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学生；以前有“体面的工作”，因为经济问题或生活作风问题被处理过的党员或干部；因为“灾荒年”而有小偷小摸行为或“投机倒把”行为被处理的人；因为身体残疾无法找到工作的人等等。

黄队长说，“范哈儿”本质是好的，只是一时受了坏人的蒙蔽。他让“范哈儿”参加对“老右”的批斗专案组，争取“立功赎罪”。“老右”被关在农民的牛棚里，专案组采用的基本革命策略是“车轮战法”，专案人员轮班昼夜不停地逼迫“老右”坦白交待“三反罪行”。对付“老右”的具体“专政”措施有罚站、跪瓦片、脖子上吊铁锤、大会批斗等。几天下来，“老右”由于身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已失去了人形，脸色青白、双脚肿大。轮到“范哈儿”晚上站岗时，他让“老右”坐下来歇一会儿，还偷偷地拿来一些馒头和稀饭。“老右”说：“不要这样，他们发现了你脱不了手。”“范哈儿”说：“他们斗人斗累了，都睡觉去了。你赶快吃。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想不通，我知道你是好人，总有伸冤的一天。”

随着运动的深入，又揪出了几个暗藏的“阶级敌人”。黄队长将运动骨干分成两个小组，轮流“抓革命、促生产”，批斗、筑路两不误。

一天清晨，“范哈儿”起床后正在洗脸，只见上油房生产队的农民朱四气急败坏地从屋后的山坡上跑下来，大叫：“不好了，你们的人上吊了！”“范哈儿”和几个工友跟着朱四赶到山顶，只见一棵大松树上吊着一个穿蓝色棉衣的人。“范哈儿”说：“是‘老右’！”他抢到前面，抱住“老右”的双腿，在大家的帮助下，将“老右”脖子上的棕绳解下来，随后做人工呼吸，见“老右”脸色变黄，几个人又七手八脚地将“老右”抬到筑路队的医务室，叫医生来抢救。这时，黄队长披着军大衣走过了，略微看了一眼说：“这小子畏罪自杀，有什么好抢救的！‘范哈儿’，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在黄队长的淫威面前，工友们都不敢吭气，眼看着“老右”咽气。

“范哈儿”由于同情“阶级敌人”，被驱逐出了专案组，与几个被“打入另册”的“阶级敌人”一起劳动改造。筑路队的民工都是干体力活的，在劳动上难以分等级。对“打入另册”的人的待遇是不准参与“革命群众”的政治学习会，只有被批斗时才被弄来低头认罪。平时则被指定做最重最脏的活，而且时间无限制。

见到“范哈儿”落到这个地步，他的相好“驼子”停止与“范哈儿”一道吃饭，不再答理“范哈儿”了。有人趁机对“驼子”说：“范哈儿一个残疾人，现在又成了被处理的对象，肯定没有前途了。”

你还不趁早与他彻底划清界线？”还有人说要给“驼子”介绍新的男朋友——黄队长的弟弟——说虽然是农村人，但黄队长有办法将他弄到筑路队做正式工。

一天晚上，开完“斗私批修会”之后，“驼子”把“范哈儿”叫到了工棚旁边的简易篮球场的篮板下面，说：“我们来好好地交换一下意见。把各自的想法说清楚。”“范哈儿”在黑暗中看不清“驼子”的不自然的表情。他把手中的烟头扔掉，说：“你就不要绕圈子，讲大道理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绝不拖累你，影响你的前途。但我仍然会记住以前那些美好的时光。希望你找到一个好人。今后能够拿到红本本。”说完这些话，“范哈儿”头也不回地向他住的工棚走去。

与“驼子”分手之后，“范哈儿”话更少了，别人拿他开玩笑，他也不回应。晚上，开完批斗会或政治学习会，累了一天的工友都睡觉了。“范哈儿”还一个在坐在工棚后面的山坡上抽闷烟。

“清理阶级队伍”之后，跟着是“一打三反”运动。“范哈儿”一直挨批判，只是因为“出身好”，没有受到“严打”判刑。这时，筑路队流传一个关系到民工们命运的小道消息：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筑路队将解散，重庆招雇来的民工，除了极少数政治上可靠的，大部分将遣送回原籍。

不久，这个小道消息得到了证实。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黄队长宣读了上面的红头文件：筑路队停止工作，民工分期分批进行遣散。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表现，组织上选留了20名“优秀民工”，加入正式工的行列。“驼子”和曾经去总部食堂工作的“汤元”榜上有名。听完文件，没有被留下的民工都泄气了，拿“红本本”的梦想彻底破灭。“范哈儿”回到工棚，闷头大睡。

第二天早晨，不见“范哈儿”起来吃饭。开“遣散动员会”了，也不见他来参加。黄队长派与“范哈儿”同一间工棚的“干虾”去叫“范哈儿”。“干虾”回报说，“范哈儿”躺在床上说胡话。黄队长冷笑一声说：“这小子装疯？对抗遣散。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干虾”向黄队长附耳小声地说：“看样子真的疯了。”

黄队长不相信，带了几个骨干来到工棚，只见“范哈儿”将被子撕得一条一条的，手拿一本红封皮的“毛主席语录”，边舞边唱：“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红本本，红本本，我当正式工，要个红本本！”黄队长狂叫：“范哈儿，快给我闭嘴！再打胡乱说，就把你捆起来！”“范哈儿”似乎没有听见，竟将“红本本”挥舞到了黄队长脸上。黄队长一挥手，几个骨干一拥而上，将“范哈儿”按住，捆成端午节的粽子一样。“范哈儿”抬起头，发现了“驼子”在围观的人群中，就喊道：“驼子，快拿红本本，我要红本本！”“驼子”脸一红，转身跑了。

黄队长嘴上说“范哈儿”是装疯，心中还是有数的。为了不影响民工的解雇、遣返工作。他决定将“范哈儿”送到附近一个精神病医院，将“范哈儿”的“疯病”控制住，迅速遣返。大约一周之后，黄队长派人将“范哈儿”从精神病院接回来。“范哈儿”已不是原来的“范哈儿”——头发蓬乱，脸色发灰，目光呆滞。我去他住的工棚，只见他在默默地收拾东西。我说：“你好些了？”“范哈儿”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下门外，说：“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病，我是想不通呀！他们用电针打我，还问我为什么要装疯卖傻，破坏遣返。直到我答应乖乖返回原籍，他们才放我回来。”我说：“你回去做什么呢？”他说：“像我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路子，听天由命吧。”

筑路队安排“范哈儿”和“干虾”等20余人作为第一批遣返积极分子。每人奖励一册新出版的“毛著”，外加一朵大红花。在欢送锣鼓声中，我和等待下一批遣返的工友们与“范哈儿”挥手告别。

十多年之后，我从遣返回重庆的工友那里听到“范哈儿”的消息：“范哈儿”因为身体残疾，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在街头拾过破烂，擦过皮鞋，一直未找到老婆。总之，孤身一人，贫病交加，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京华掠影 ——2012年5月北京访师友见闻

2012年5月18日，又到北京，住了一周。因为年事已高，是去和北京告别了吗？上世纪的1956年秋，那是一个“秋天里的春天”。初次去，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关键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文章。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图景！

从那之后，记不得去了多少次了。

历史走过曲折的道路。

文革中，陆定一同志在秦城狱中，两个月没解下手铐。可想而知，想“方便”也不方便。

其实，他有什么罪呀。通过什么法律程序了吗？

到今天，文革的阴影还没有完全退去，“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还可能重来。”温家宝总理这样说。在北京这一星期，我的感受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

一 何方老有话要说

去北京的直接原因，是何方老的召见。他在信中表达“希望一晤”。第二封信中又说：“惜山遥路远。”老人家已90高龄。怎能不去呢！交通倒也方便，火车直达，在上边睡一觉也就到了。

出发前，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件事，也是因为学习摄影，把他先后送给我的5本书《党史笔记》等放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缀一束月季花，一个磁盘，上边有范曾所提“太史齐简”。觉得这是恰当的。画面色彩甚好，心想，可名之为“何方颂”。

何老看到我去，当然很高兴。他说：“我来安排，请你去住一个地方。享几天福。”还要通知一些朋友一聚。夫人宋大姐十分热心，立即操作。被我坚决劝阻了。我说：“我看看何老，听何老谈谈，目的就达到了。万不可！”

我跟何老说：“我是带着问题来请教的，有备而来啊。”他很高兴。面对这位当今之世国际问题的观察家，我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如何来看美国？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小平遗嘱两个版本，都肯定美国。而主流媒体仍视其为潜在的敌人。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没有普世价值”。军方鹰派准备打仗，要打到美国去。但有人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军事力量，幸亏在美国手里。”（刘亚洲语）这个美国怎么说？

二、国际形势会发生大战吗？人类会毁于自己的手上吗？还是会逐步发展走和平统一的路？

三、中国民主宪政这一关怎么过呀？

何老畅谈。条理清晰、思想深邃、思路开阔。我发现宋大姐坐他后面立即紧张地记录，还动用了录音笔。后来她说：“一些问题，他过去还没有讲得这样详细过。”

我计划出一个小册子《假如马克思还活着》，目录和主要篇目早已寄给了何老，请他指教，希望他写个序言。这是借名人以自重吧。其实，这是一个最通俗、最简要的小书。何劳何老的如椽之笔呢！没有想到，何老明确讲：“我不可以写！”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比你走得更远了。”写当然是要讲真话。这不是要惹麻烦了吗！

原来《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刊出吴光明先生的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前期后期，一贯正确。他这样说这不奇怪。但何老认同没有前期后期，这引起误解和惊讶。他想和我谈谈，可能就是想说清楚免得误解下去。

吴的没有前期后期，是说它一贯正确。

何老也认为没有前期后期，是认为实践证明他始终是错的。但目前还是思想垄断，还高举马克思主义。他不便多讲。

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详细做了分析。何老认真，对这个问题，后又来信作书面陈述。

中午，何老夫妇带我们到一个山庄就餐。那是一个高档又有野趣的地方。

和何老一聚，谈到马克思主义，附言数语如下，供参考。

一、碰到鲍彤同志，对这个问题，他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中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他“提倡自由”。

二、辛子陵在最近的文章中一再强调恩格斯的那九十六个字，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个理论体系，用之于实践会造成灾难后果。

三、我在即将出版的《假如马克思还活着》一书中，第一篇是《共产党宣言的精华和糟粕》。谢韬老说可列入思想史，起码是研究的开始。思想垄断，对马克思的著作只能学习怎能商榷呢？该书最后一篇、最后一句：“我们什么时候能废除出版工作的预审制，（如英国三百年前），人民可以享受言论出版自由，以告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

二 重返十三陵水库

何老居北京东北的顺义区，和十三陵水库是同一个方向。从他那儿出来，顺道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了。许多年间，不论在什么地方，我心里都为自己是十三陵水库的建设者而自豪。它是当年首都各界人民劳动的结晶。毛泽东在大坝之下给畚箕添土，周恩来给运土的小车背纤。我们列队挑土上大坝，日复一日。坝很高，很陡，木板很窄，是反复讲土不能多装，否则出问题。

没想到眼前的情景是库底已经干涸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和大坝平行有了公路，没有桥，可见干涸已久。这真奇了！这是上帝开玩笑，还是我们应知而未知？当年那千军万马、轰轰烈烈，不是唐吉珂德的闹剧了吗？既然没有北水南来，何必筑坝呢？

51

十三陵库区，河面很宽，这本是大水造成的，现在是广阔的荒滩。旁边有为旅游业服务的几匹马点缀着这寂寥的荒原，一时还没有什么生意。

建国后对治水总有豪言壮语，但为什么一再事与愿违？黄河三门峡彻底失败，只培养出一个道德的制高点，那令人尊敬的黄万里先生。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人称是一次豪赌。前几天还有一篇文章说三峡出了大问题。令人揪心。这个材料被李锐老要去，实在不想跟他谈三峡之事。他已九十六岁高龄，他的心情又是可以理解的。他曾经跟外孙女深情而郑重其事地讲：“你要记住，外公是反对上三峡大坝的。”河南有一系列水库在一九七五年依次崩塌，淹死多少万人呀！这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

在进城的汽车上，当年在北京生活的往事在脑际闪过：

我们的系主任安岗说：“多开一些课程，就填鸭吧，回去以后再慢慢消化。”机会难得，这真很好。在先农坛看足球赛，坐在主席台前球场边。周恩来走到我们中间，鼓励我们要给客队加油。在首都剧场看话剧“蔡文姬”，第二天在晚报上才知道周总理坐在最后一排。散场之后他步行送演员们回到宿舍。除“四害”，我们停课去朝阳门的城墙上捉麻雀，敲起脸盆，杀声震野，课也不上了。后来又给麻雀平反，说它还是吃了很多害虫的。要捉老鼠，校内没有老鼠。停课去农村，跑到酒仙桥，把农民的大草垛推倒，终于捉到几只老鼠，凯旋而归，农民损失很大。他们也知道应该突出政治了，不好说什么。徐水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各路专家往访，无不高度赞场，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我班有半数同学前去，分工撰写一本书。后来看事情不妙，不了了之。因为开始饿死人了……想起这些往事，有时不禁会有会心的微笑。有些觉得沉重。

三 前往谢府拜望

听说我来北京，谢小玲热情地说：“还是住到我们家里来吧。”我也真想去，起码再去住一天，再去感受谢韬老师和卢玉老大姐营造的氛围。次日我还是立即去了。以去向恩师拜别的心情。虽然他们

已不在

家里的情况略有变化：厅堂正中原来的是一张不大的周恩来像。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领袖像，而是小玲他们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清场时抢救出来的一个纪念品！现在换上了父母的遗像。这张照片很大，是有生活气息的成功的人像作品。两侧是辛子陵先生写的对联。

桃李天下 一代宗师传佳话

指点江山 千古文章留美名

我注意到墙角上谢韬老用于健身的刀枪剑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只在书橱里留下了他练功的照片。前些年他做各种练功的招数，我还拍了一些照片。

和谢老是师生之谊，只是一九五六年我到校时，他是副校长已经去了秦城。仲甫先生说：“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这是最美好的生活。”谢老不仅如此，他把监狱也变成了研究室。这是那个年代特殊的政治生态造成的一个特例。

吴老（吴玉章，中共的四老之一）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小罗（罗是吴老发展入党的晚辈），谢韬不是什么胡风分子。我把他接到家里来了，你要抓就到我家来抓吧！”罗诉苦说：“这是钦定的呀！”谢老说：“你们不要为难了，我去坐牢。”一去七年。在狱中他是一批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政治教师。这样，他在里面一边坐牢一边可以研究学问。

一九九八年谢韬老有惊人之笔。他的那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共运思想史上的惊蛰春雷。八十五岁到南通来，使我得以先睹为快。古纪柔（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节目主持人）说什么“数十年的挚友，去南通是商量发表此文的得失大计。”我立即做了澄清和批驳。但此种误会也证明谢老长期关爱有加。平时他在文事上多有指点，建议把拙著《历史曲线的反思》改为《在历史的天平上》。并热情著序。在这篇序言里，他把陈独秀和毛泽东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从十四个角度做了比较。这形成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法。由于谢老文章的巨大影响，导致美英法各国的电台都谈到这本书的出版，导致两次被抄没销毁，导致终于形成四个版本流行海内外。卢玉老大姐又花钱制作一批，广赠四川家乡父老。她旋即去世，成为临别的赠品。胡晓风（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说：“对此举，大家无不为之感动。”我是书的作者，感念何如！

一年夏天，收到卢大姐寄来的二百元。我们问这是做什么用的？她才说：“天太热，正走到邮局，寄给你们买点冷饮吃吧！”以如此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和谢老夫妇这样的师生之谊是罕见的。

在京数日，小玲一直在为我们操劳。

四 监复老的身影

小玲打电话给李锐老，约定往访。她知道我没见过姚监复老，而又希望看到他。打电话请他也去，对此我是喜出望外。这些年，姚老帮助九十多岁的胡绩伟，下载其思想，发表一篇篇系列文章。胡老关心到我，他也就关心到我了。没有想到他也已经是耄耋之年。

在李老家，姚老到得略迟。他坐下来就奋笔记录李老的发言，而后两天诸友一聚的宴席上，他也只顾奋笔记录朋友们的高论，全然是以职业革命家的使命感在埋头苦干。他编辑的《胡赵新政启示录——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剖析》已经出版。所好有一个一国两制的香港，那儿作为英国殖民地时，就没有出书的“预审制”。姚老告诉我：“领导上明确指示，这本书不准出！我说作者不是我，是胡绩伟呀。”最后是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终于享受到了出版自由。

胡老长期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和社长，是全国传媒的领军人物。

约十年前，胡老在新加坡发表了《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一文，文章很长，连载十五天，引起震动。有关部门请示中央“怎么办”？胡老告诉我，江指示：年纪大了，随他怎么说吧，不要理他，否则更不利。胡老风趣地说：“我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随我怎么说了。”其实胡老为文从来是极为严肃

的。

鲍彤为此书写序。他说明胡老在历史关键时刻，担起了拨乱反正的重任，胡老寄望于后人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要有自由的思想。”

现在他的思想，通过监复老的笔不断传之于世。

五 在李锐老府上

每到北京，总要去看望李锐老。有时也没有去：一次会上，几位同志要去看望，我打电话，玉珍老大姐说：“在医院正装起搏器呀。”这当然不便去了；有一次我住在外交学院，想到李老正忙，他在赶写《大跃进亲历记》的下卷，所以只是打个电话问候，不去打扰。为此石磊同志（院长）批评说：“你错了，他把路怎么走都告诉你了，应该去呀，我可派车送你去呀！”我看到一些境外的记者、学者，对看到李老觉得不容易，都觉得很荣幸。当然，他是中国宪政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他发出的时代强音。

他已九十六岁高龄，想看到他的人也多，我想在他那儿停留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没想到老人家情绪很高，侃侃而谈。比过去任何一次说的都多，都清晰。语速如同五六十岁的人，毫无老态

内容广泛涉及延安时代的风云，建国后漫长时日的朝中之事。姚老认真记录。在我思想上留下的亮点有：

1. 延安抢救，打出特务一万五千以上。敌方有材料证明一个也没有派过来。

2. 最早了解毛泽东的是杨开慧，她留下了书面材料，说他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我在《千古绝唱蝶恋花》一文中写到杨的愤慨，但话没有说得那么难听。

3. 我不想跟李老谈三峡问题了。但他给我的书面材料中还是提到：“黄万里来我家两次，我总是记着他的愤慨的话：三峡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同岳王庙里那样铸三个跪在那里的历史罪人。中间是钱正英，两边是张光斗、李鹏。黄万里了不起。黄炎培的七个儿女都被打成了右派。”毛泽东和黄炎培有著名的“窑洞对”，其中强调发扬民主，让人民讲话。对照看是极大的讽刺了。

4. 李老给了我两个书面材料，其中他说，我认为社会进步不靠革命要靠改良，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Reform）。他说：“我这一生，做人和做共产党员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不惜一切坚持前者。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

5. 他说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错了（和何方老的观点相同）。上边来人，叫我不要这样说，但我这样说并没有错。

在李府，当然看到张玉珍大姐。我怀着敬意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正好有李老写的一个条幅《九十一岁装支架有感》：

安装起搏器回生，心中依旧不太平。

妙手又将支架搭，仍留老骥续争鸣。

这样的诗，真是贴近生活，而又反映出了精神实质。

离开李府前，李老把给张宣三的那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写的序言，复印一份给我。可见他很在乎这篇文章。其实，这本书他早寄给我了。这些年李老关怀甚多。我对他说：“这些年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王若水的那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把马列分割开来，拯救了马克思主义。李老说：“是的，这篇文章我也给了耀邦同志，他说启发很大。”

六 杜光的饭局不平凡

22日在李锐老家，姚老给我悄悄讲了一句话：“我打电话过去，杜光明天请你吃饭。”这就是说此次北京之行可以看到杜光了，甚喜！事后知道，有此饭局我是碰巧了。他是为《回归民主》一书的出

版，要感谢有关同志，特别是要感谢鲍彤为他写序。这样说，我这次有缘可以看到这位长期深陷图囿的大政论家了，更不容易。

杜光安排的这个饭局，有不凡的重要意义。

时间在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地点在中央党校北门外的那个大饭店中。

去年（也可能是前年了），陈奎元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入主社科院。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否定普世价值。核心内容还是强调阶级性而否定人性，批判人性论。贾庆林在《求是》上立即发文呼应。接着吴邦国又把这个理论问题提到了政治层面。他说：“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并具体化为“五个不搞”。为此我写了一个小文章《否定普世价值意欲何为？》吉林省的历史学家靳树鹏先生说：“这一问，问得好！”杜光说：“仍然是通俗生动的文风！”我的文章不为人所注意，影响很小。而杜光先生不然，他是针对生活中涌现的问题一步不让，写得多，是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你说“五个不搞”，我就一个一个跟你谈。当今理论战线上有如此胆识，如此执著者无出其右。他的《杜光文存》人们或复印转发，或装订收藏。

他选取和吴邦国“五个不搞”进行商榷的文章，出了一本书，题目是《回归民主》。杜光说：“先有几位领导来建议不要出，后又有更高的领导来说此书不准出！”书稿早到了香港，我打电话过去，讲了领导的指示，他们说已经印了。领导说：“印了不准卖。”我又打电话过去，他们说已经卖了一部分。领导说：“没有卖的不要再卖了，我们全部买断。”有人开玩笑：“杜光有稿费可以请吃烤鸭了！”也有人说：“香港的出版界可以多印几万本，反正有人买断。”

这样，《回归民主》一书创造了禁书的新形式。在抄没焚毁、胎死腹中之外又有了花钱买断的办法。当然这又增加了维稳经费，也有人说增加了GDP。

不过有了电脑，到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应该说已经走过了禁书时期。不论用什么办法，禁书已经没有作用，这是赛先生（科学）帮了德先生（民主）的忙。但杜光还是只能送了我一本《回归民主》的影印版。影印的质量差一点，但单价贵得多，它却更有价值。它是历史现象的一个见证。

这个饭局是杜光先生战斗历程阶段性的标志。

席间，应大家的要求，鲍彤这位党的总书记的秘书做了长时间的发言。高屋建瓴，落地有声如同他的文章。一位杂志社的编辑递过一个条子问：“形势会失控吗？”鲍明确回答：“不可能！我们要相信党的控制能力。”对此他从历史的角度做了论证。

七 “天外天”的欢聚

当天晚间，又有“天外天”饭店的欢聚。小玲告知：“你可以看到王康。”我刚在家里看到他的文章，是他先后接受十多家国外传媒采访的精彩文章。怎么他从重庆也到了北京？席间一睹他的风采：小胡子如同捷尔任斯基，大额头如同列宁。讲起来细致入微，不时有惊人之语。现在他俨然成了“重庆事件”的发言人、评论员。大家侧耳聆听，他娓娓道来：薄是小毛泽东吗？不！他要超过毛泽东，他要建立东方的大帝国。他已经完整形成并认真实践着纳粹的经验，并已经打通了通向北京的路……这次及早的暴露，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他对中国的变局认为：个别事件也可能震动全局，在国际民主化的浪潮中许多国家大多如此。对如何发展，我们也只能是走着瞧。鲍彤认为：促进社会进步，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几天中发现人们共同的认识是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政局已经叫人惊心动魄了。细听也有不同的声音：

1. 有人认为社会是溃而不崩，会拖很久；有人认为大变局就在眼前，拖不过五年；也有人说十年。
2. 对温家宝总理，有人说他是作秀，有人说他可敬可爱。王康说：“他的话叫我感动。”

3. 对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全部错了，有人认为它还是与时俱进的。说恩格斯彻底否定了那些原理在实践上的作用。

这些问题录以备考。

八 在国防大学门口喜得《李斌画集》

我们是怎么了？王若水为党的理论建设立了大功，却并不见容，流落海外，客死他乡。这是规律吗？北大校长马寅初的人口论为民族立了大功，却软禁二十年。孙冶方、顾准谈到市场经济，是先觉者，却家破人亡。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对毛泽东的“一分为二”进行补充是正确的，是大贡献啊，却也惨遭不幸……

眼前一个例子是辛子陵，他赤心救党，献计献策，文章甲天下，誉满海内外。到京传已解禁，既然如此，小玲向导前去看望。他是国防大学的教授、大校。到了门口，说是有特殊任务不准入内。小玲能干，讨价还价，总算还是争取到夫人李大姐被允许出来和远道而来的客人见见面。她带出一本《李斌画集》相赠，以此表示谢意。

当晚看画集感到不安，这样精美高档的东西，如此画技和思想境界的不凡，这样难得的佳作怎么送给我了！一幅《假如》就发人深思韵味无穷。假如什么？是假如鲁迅活着。毛端坐在沙发之上，鲁迅转身背对吸烟，挺胸昂然，中间一个藤椅打翻在地……一九五七年湖南人罗稷南对毛有设问求答的著名故事。李斌是艺术再现了。

九 去看几个豪华山庄

二十五日要离开北京了。已经预订了下午九时四十分的火车票。

早饭后驱车去回访文殊先生。他白发垂肩，仙风道骨；四时起床，即上电脑。足不出户知天下之事，多有指点。家有巨幅“宁静致远”碑帖。是从西安碑林所得。院内花卉簇拥，瓜棚蔽日，环境优美。

小魏、高洁陪同前去看北郊的这个山庄那个山庄，还有叫外国名字的什么山庄，风格各异，极尽豪华之能事。表现为安谧、精致，雕塑很多，人迹罕至，如到欧洲一游。各有背景，均是红二代建设的人间乐园。我知道过去这一带是北国的蛮荒之地，这些年成了远离人间的仙境了。不一一细说。

十 告别北京 走过三个胡同

下午五时提前吃晚饭，这样还有四个多小时在北京逗留。

这一个星期，小魏担任的哥的角色。实在是十分感谢。他问：“还想到哪里去吗？”我说：“一路向南（我们住在北五环回龙观），去三个胡同再去看看。”我具体告诉他，经雍和宫向南到“铁狮子胡同一号”，然后再向南到“富强胡同六号”，再向南到“箭杆胡同二十号”。

他说：“这条路你熟吗？”我只知道大方向，他于是上电脑查地图，对路线做了详细记录。

这三个地方都是我经常怀念、深有感情的地方。在我告别北京之际，想最后再去看一看，也正好顺路。

铁狮子胡同已改名为张自忠路。小魏问及张自忠其人。我说：“他是在鄂北战场牺牲的国军将领。当时的国军只能理解为国家的军队。他是抗日为国牺牲的英雄，在全国用国军将领命名的街道不多。昨天听王康说他们的大型国画《浩气长流》正在台北展出，就是歌颂这些抗日英雄的作品。”

在这胡同一号的门前，两个大石狮子仍端坐两侧，体态雄伟。我的个子已经很高，但伸手还够不到它的下巴。看它的那神情是无比的惊骇和愤怒。我一再提到，雕刻者是预言家吗？“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它的脚下，有一个小石碑记其事。段祺瑞听说他的部下打死了一些学生，顿足大呼：“这断送了我一生的名节！”后来当众下跪向人民请罪。看来人称北洋军阀的人物多少还有点共和思想。他占领北京拒绝入住中南海。把自己的政府安排在这个一号。清朝时这儿是陆军部海军部。中山先生手

无寸铁，一九二五年到达时，组织了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当时北京的许多报纸有绝对的新闻自由。鲁迅先生痛斥当局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和朱自清的批判文章都可发表。他安排中山先生比邻而居（在五号）。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亡故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大学在西郊，唯独新闻系在此。我在这儿生活三年。这三年生活波澜起伏极富戏剧性。老师们还是传授了许多知识。安岗、冯其庸、高放等老师不知身在何处，理当一一拜望，深感不安。只有在此深深鞠躬致敬，表示谢意！也只能是如此告别了。

遂去富强胡同，途经菜市口，这是谭嗣同等六君子为立宪而断头之地。这儿车如流水人如潮，没有下车，不知道还有什么纪念性的标志否？

不料旁边的富强胡同静悄悄，长长的小巷空无一人，只有一辆汽车停在那儿，有一棵和巷子不相称的大树歪斜地长在那儿。几步到了六号，朱门紧闭。这儿名声很大有什么特点吗？门牌不是钉在门上，而是钉在外面的墙上，比一般的门牌大四倍左右。上书富强胡同六号。这样把它在巷子里特别突出起来了。左侧墙上还有一块小牌子，上书“不是旅游之地禁止参观”。这恰恰证明了是一个应该参观的地方，只是不准看而已——煞费苦心，也很有趣。

主人住在此十五年了。这显然突出了他的历史地位。在刚入住时，新华总社的冯东书先生说：“他胜利了！”我一时不解，渐渐知道原来是道德伦理的博弈。这些年又有了传奇故事，宗凤鸣，一位党委书记自称气功师，不断前来所谓发功治病，这得以留下了他的思想，收入文集，传之人世间。昨天在李锐老那儿，他谈到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是共产党帮助共产党。这儿也是共产党帮助共产党，只是要取地下工作的形式帮共产党了，耐人寻味。这次来，得知宗先生已仙逝。他的传奇故事，将永留人间。

主人的警句很多，从目前形势的需要看，人们突出的传诵了他的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不培养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危险的。”话不多，真是石破天惊。

我在这门前停留三四分钟。

继续向南，到达箭杆胡同。这一带比过去整洁，所有墙壁都粉刷得干净。二十号门前新有一个小石碑，上书“陈独秀故居，文物保护单位”。可是进去一看破烂如旧。比建国前上海的贫民窟还要脏乱拥塞。上次接见我的房东孙志诚先生已经故去，这次是他的弟弟孙志广接见我。他对这些年北京建筑辉煌，而这儿光景依旧，颇为不解。近二十年前，来此写了一篇《瞻仰那一个老屋》，得到谢云先生的肯定（人民出版社副主编，人物杂志主编）。他说：“我在几处地方都说大家应该看看这篇文章。”几处转载。在那个文章里，我就谈到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句话，不料今日仍如此。为陈正名，跑遍他一生活动的许多地方，撰写了《探访陈独秀》一书。这儿是起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感情的地方。

走出门来，碰到一个邻居。他看我苍然白发，老而耄矣！问：“你老到此是和陈独秀家有什么关系吗？”我说：“有关系，他是我们党五届总书记，党的创始人呀！”他觉得答非所问，转身而去时说：“你说的也不错，如果是他当家就好了。”话里有话。只可惜未及进一步领教。当然，陈越到晚年，对民主越有深刻的思考。他把民主、自由、法制视为普世价值，回到五四去了。

北京一周。多得何方老，李锐老，监复先生，杜光先生等的关怀，更有小玲，小魏及高洁老弟的帮助，时间紧凑，收获很大。心满意足和北京告别。在此对大家表示感谢。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又回到了濒江临海的南通家中。